

人生借鉴译丛

Vierziger

# 四十不惑 名人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时代》周刊著名专栏作家真诚奉献！

中华书局

Vierziger

## 四十不惑

“铁血宰相”俾斯麦在四十岁时感觉如何？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权力和情人中选择了哪一个？《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怎么花钱？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龄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已经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

著名的《时代》周刊《谈天说地》专栏主笔格哈德·普劳泽对这一类问题作了探讨，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

ISBN 7-101-03974-X



9 787101 039740 >

定价：14.00 元

# 《人生借鉴译丛》

孔德明 印芝虹 主编

## 四十不惑

[德] 格哈德·普劳泽 著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张 晶 马丽丽 译

孔德明 校

中 华 书 局

**Vierziger. Ein Geschenk für alle zwischen 40 und 50 by  
Gerhard Prause**

**Copyright © 1983 by Gustav Lübbe Verlag Gmb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京图字:01-2002-3320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十不惑/(德)普劳泽著;张晶,马丽丽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人生借鉴译丛/孔德明,印芝虹主编)

ISBN 7-101-03974-X

I.四… II.①普…②张…③马… III.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822 号

---

**书 名** 四十不惑

**丛 书 名** 人生借鉴译丛

**著 者** [德] 格哈德·普劳泽 [德] 曼弗雷德·B. 梨木若特 图

**译 者** 张 晶 马丽丽

**责任编辑** 王瑞玲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6<sup>3</sup>/<sub>4</sub> 字数 80 千字

**印 数** 1-5000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974-X/I·505

**定 价** 14.00 元

---

## 前 言

小的时候,人们渴望自己尽快成长,以便早日长大成人。但长大后,即便才二十多岁,大部分人就想推迟年龄增长以及后来成为老人的过程。没有人愿意在二十六岁时就被算作三十岁的人,即使到了二十九岁也还是不愿意;但在十年之后,也就是三十九岁的时候,大家却愿意说自己仍属而立之年。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的年龄段,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岁的人同样如此。

可见数字会对人产生一种很大的心理影响,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尤其是生命年轮中的整岁数,它们让人感觉是一个跳跃,一个深刻的变化,但同时也给人以欣慰,庆幸自己毕竟达到了这个年龄,因为这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情。逢十的整生日给人们提供了契机,去感激和总结,去回顾过去十年,也去展望未来十年,去祝福自己以及享受别人的祝福。庆祝生日是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习俗。

“人生借鉴译丛”向大家讲述古往今来著名的或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在某个年龄段的种种境况遭遇:他们的生日是如何度过的?他们生理心理状态如何?经历过什么?有何规划以及有何行动?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困惑?他们是否幸福?对未来还有着信仰,还是早已灰心断念?在讲述的过程中尽量做到让名人自己来谈体会,而且尽可能详尽,为此我引用了他们的信件、日记或自传里的一些文字。因为他们自己的表述最能说明他们期待什么,他们担忧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而高兴。

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是男是女,不管你年岁几何,都将在这些表达和描述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和境况。因为从根本上说几乎一切都已经被其他人经历过、遭受过、期待过、畏惧过,包括衰老这惟一能够延长生命的现象。同

时，以整个生命长河为背景来观察某个特定的年龄段，人们会不断地认识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这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即使伟人、名人和成功人士也会一次次陷入茫然无助，甚至绝望的境地。然而，读者看见，生活又继续前行了，并且往往就在这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幸福迎面走来。

格哈德·普劳泽



**奥托·冯·俾斯麦**

**Otto von Bismark**

**1815—1898**

“要么成为最坏的流氓，要么就成为德意志最伟大的人。”



# 死亡线上的普鲁士人

——俾斯麦

奥托·冯·俾斯麦：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宰相，著名的“铁血宰相”。他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使普鲁士王国迅速强大，并在普法战争中获胜，最终使德国统一。

经常有人这样说：四十岁的人应该有所建树，应该身居高位，至少应该知道下面的路该怎样走。许多人把四十岁看作是一个人生转折，至少是在别人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因为从这时起生命进入第五个十年，当他自己也到了这个年龄段的时候也许感觉就会不同。

2400年前，希腊医生希波格拉底将人的一生分为七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十年，头三个阶段被看作上升阶段，后三个阶段被看作是下降阶段。希波格拉底认为，四十岁的人开始迈向生命

的第五个十年,这是人一生中的巅峰时期。在他之后,许多人也都这么认为。

后来,新的年龄划分更有利于四十多岁的人。有人把人的一生分为九个十年,四十岁的人仍属于上升阶段,而五十岁的人才到达中间阶段,随后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的人为下降阶段。当然这只是泛泛之谈。至于具体的人是怎样的,当然无法知道。一个二十岁的人也可能已经到了生命的中期,甚至可能直接到了生命的末尾。这应另当别论。但是可以看出,个别人的生命长短与平均寿命及期望的生命的过程并不相同。

俾斯麦四十岁时,他好像不再有上升的感觉,而是觉得自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他哥哥祝贺他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他向哥哥坦言道:“非常感谢你的生日祝福。面对四十岁的门坎,我感到不寒而栗,我即将跨越生命的顶峰,然后顺流而下,一天天向祖先的坟墓靠近。而我还自以为正处于生命的开端,计划着做这做那。自1839年我回到科尼普豪夫以来,时间过得多快

啊……”

奥托·冯·俾斯麦四十岁时，可以说他已身居高位了。他于1815年4月1日出生于祖籍地——易北河东部的阿尔特马克，自从1563年以来俾斯麦家族一直居住在那里。从法律系毕业之后，俾斯麦失望地被局限在管理祖业财产的事务中。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要么成为最坏的流氓，要么就成为德意志最伟大的人。”后来，他步入了政坛，开始是州议会成员，后来成为第二普鲁士议会成员。他四十岁时已经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议院中做了四年的公使馆参赞和公使，与约翰娜·冯·普特卡门结婚九年。他们有三个孩子：七岁的玛丽、六岁的赫尔伯特和不满三岁的威廉。

直到一年后他的四十一岁生日，俾斯麦才坦然接受自己已是四十岁的人的事实。他也不再会有顺流而下、离家族坟墓又近了一步的想法。但是四十岁的他要突然地、出乎自己意料地面对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比他大五岁的哥哥也造成了困扰。他哥哥写信祝贺俾斯麦的生日，

一天后，俾斯麦给他哥哥写了回信：“我为你感到惋惜，你发福了，因为我有过这样的经验，知道身体发福会带来怎样的烦恼。”他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一直喜欢吃喝的俾斯麦很快就变得很胖了。后来，他的体重竟达到了 125 公斤，但是这时他已经跨入六十岁的年龄段了。

在他四十四岁生日的这一天，即 1859 年 4 月 1 日，俾斯麦接受了他在圣彼得堡的新职位，在沙皇帝国任普鲁士公使。那天，他开始给留在法兰克福的妻子和孩子们写信：“我最亲爱的！今天，你和孩子们的来信令我非常高兴，它使我整整半小时完全忘记了我们之间相隔的 300 英里。……1859 年 4 月 1 日圣彼得堡。”三天之后，他才得以把信继续往下写：

“前面几句话是在我生日那天写的，后来因公务繁忙就中断了。说来很巧，我刚好是在 4 月 1 日开始任职，那天沙皇亲切地接见了，这见面成了一份生日礼物。然后，我和克虏伯喝了莱茵河葡萄酒和香槟并为你祝福，共花了七个卢

布！我们喝得非常开心。但我的工作太多，令我有点儿吃不消。从昨天早晨开始我就和麦能道尔夫谈工作，谈了五个小时，只睡了五个小时，然后又工作到现在，已经下午三点钟了，我一直在写信、口授、做必要的访问。克虏伯不是一位得力的助手，韦特又在发牢骚了。半小时以后我必须把这封信寄出。四点半我将和皇太后共同用餐，她对我非常好。我每天都要做的工作就是访问、接见，收读三封用密码写成的公函，每天来回跑很多的路。请你把所有可能带来的东西都打包，包括很多小东西，尤其是床上用品。别忘了在荷兰必须事先和搬运商说好，东西要装上船，要运到圣彼得堡，不能只送到喀琅市就靠岸。否则需要花很多钱。粗糙的木制家具、床架等等不需要箱子，直接捆绑就可以了。胡桃木在这里就像花梨木一样贵重、一样时髦！我本来想给你写一封长信，我亲爱的天使，可现在我必须快点写完。我最乐意给你写信，我的心肝。在这里的4月1日，也就是德国的4月13日，我又过了一次生日，就是挨着你生日的那天。涅瓦河

像岩石一样坚硬，运货车行驶在映着路灯的冰面上和路道上。代我亲吻孩子们，你一直是我的最爱，愿上帝与你同在，你最忠诚的俾斯麦。”

由于俄罗斯日历与德国日历有时间上的偏差，所以他在4月13日再次庆祝他的四十四岁生日。俄罗斯的4月1日是德国的4月13日。所以，他的生日几乎和4月11日出生的妻子约翰娜同时庆祝。在她的这一天生日，即三十五岁生日，俾斯麦只发了一封电报：“问候你，祝福你！我很好，涅瓦河还结着相当厚的冰。俾斯麦。”几天后，他才有空给妻子写了一封内容详细的信。他给她描述了白天所做的工作，描述他看过的想用来办公和居住的房子。最后他说：“我们喝了很贵的莱茵河葡萄酒和香槟酒为你庆祝！你对家乡情况和那里天气的描述使我感到忧伤！这冰雪世界让我第一次觉得伤感！这样的天气以后可能经常会遇到，但愿……正如我们这里的俄罗斯人说的一样，上帝保佑我们！”

四十多岁的俾斯麦在俄罗斯感到很不适

应，他等了很久才终于等到冰消雪化和灿烂的春天。可是还在初夏，他就错误地估计了天气。他在后来的《思考和回忆》中写道：“我还不适应圣彼得堡的天气。1859年6月我在一家供暖设备很好的跑马场连续跑了几圈后，没穿皮衣就回家了，路上还停下来观看新兵训练。第二天，我的四肢就患上了风湿痛症，我不得不长期和这种病作斗争。”

不久，他想回德国接妻子和儿女来圣彼得堡。四十四岁的俾斯麦后来慢慢恢复了身体，风湿病症也基本消除了，但是左腿还感到疼痛。这是两年前他在瑞典南部狩猎受伤而留下的后遗症，当时他没有在意。在圣彼得堡，巴登的公爵夫人给他推荐了来自海德堡的医生瓦尔茨。俾斯麦接受了他的治疗，对这个治疗的结果，三十三年后，他回忆起此事时仍然充满愤怒。他在回忆录中详细作了记载：“瓦尔茨医生主动提出给我开一种药……我觉得没必要用药，因为疼痛已经减轻了。他建议说，为了保险起见，防止伤口在旅途中恶化，还是应该做些预防。他说，这

个药方很方便，只需在我的膝关节上贴一块膏药，一点都不碍事，几天之后它就会自动脱落，只留下一个红斑。在没有了解清楚这个海德堡医生来历的情况下，我听从了他的劝说。贴上膏药后我安然入睡了。四个小时之后，我突然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我撕下膏药，但是不能去除已经渗入我那被伤痛折磨的腠窝里的膏药成分。几小时之后，瓦尔茨赶来，试图用小刀把黑色的药块从手掌大的伤口处刮下来，但并不成功，药物的腐蚀作用仍然持续着。我明白了，这个医生是个不学无术、不负责任的人。因为别人的极力推荐我才选择了他。他以歉意的微笑来为自己辩解，说膏药里大概是加了太多的药粉，是药剂师的疏忽。”

如果能被这样的道歉搪塞过去的话，俾斯麦就不是俾斯麦了。他要追查这件事，他向药剂师求教。他继续写道：“我请药剂师找出药方，得到的答案是瓦尔茨把药方收回而且已经找不到了。我没有查出是谁配的有毒药方，只是从药剂师那里得知，膏药中有一种主要成分据说是用



来制造西班牙持久斑蝥的。药剂师回忆说,那膏药中放了非同寻常的剂量。后来,有人提出,是不是有人故意让我中毒。我当时只是把责任归结于这个医学骗子的无知和放肆。”

俾斯麦让人对此事作了相应的调查之后确信,瓦尔茨不过是个骗子而不是一个医生:“他是由于巴登公爵夫人索菲的推荐才进了圣彼得堡儿童医院的,他是海德堡大学蛋糕店师傅的儿子。当学生时不学习,也没通过考试。他的膏药毁坏了我的静脉,许多年来我一直遭受着这个痛苦。”

俾斯麦带着还没有痊愈的伤口,忍痛坐船从圣彼得堡到施泰廷。当时,他曾被建议截肢。“为了寻求德国医生的帮助,我在6月乘船走海路,经过施泰廷到达柏林。剧烈的疼痛迫使我向恰好同船的著名外科医生皮罗格夫咨询。他建议我截肢,在关于自膝盖以上还是膝盖以下截肢时,他建议膝盖以上。但我拒绝了……”

在柏林时,俾斯麦的情况很糟糕。他在给小儿子威廉——乳名比尔写的一封信中提到:“我

亲爱的小比尔,我是如此地虚弱无力,以至于我不能直坐,也不能写字。但是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想把祝福送给你,我亲手写的祝福。同时,我还要送你两本书,是描写优秀的普鲁士战士的。那位老德夫林格尔先生,虽然他曾经是个裁缝,使用的是铁尺,但是他是我曾祖父的祖父,我们都是他的后代。你们亲爱的妈妈一直在照顾着我,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他才写了几行就中断了。“我不能再写了,我又没力气了;向祖父母问好……”——两天之后,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行走令我浑身酸痛,脑袋昏昏沉沉,容易烦躁。我很容易发火,经常三天不吃不睡。”

在用尽了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见效果后,俾斯麦决定——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去瑙海姆疗养地接受治疗。经过治疗,他的腿伤大有起色,不仅可以行走,还可以骑马。几星期后在回圣彼得堡的途中,“正如医生估计的那样,生长并且附着在被破坏的静脉中的血栓自动脱落,进入循环血液中,引起了医生认为足以致命的肺炎。但是一个月之后,我就痊愈了”。

当时,他的确相当危险。在他得到“医学判决”之后,觉得自己——后来他是这样写的——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普鲁士人”。30年后他还惊讶,自己在那种情况下最为不安的是他未成年的孩子们的监护问题,所以他起草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在法律上排除了在指定监护人问题上的干扰。”然后,四十五岁的俾斯麦就安详地等待着死神的召唤:“我平静地期待着我最后的时刻,难以忍受的疼痛也将随之消失……”

但是,俾斯麦又一次过早地自以为要去见祖先了。实际上,他在人世还有将近40年的时间,他还要创造伟大成就。在极其严重的肺炎痊愈之后,他没有返回圣彼得堡,而是留在了柏林。他于1862年担任驻巴黎公使,四十六岁成为普鲁士首相。在他人生的第五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他通过战争从丹麦夺取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叶卡捷琳娜二世**

**Katharina die Grobe**

**1729—1796**

“哦，你带来了怎样的  
悲哀的奇迹，一副被认为是  
欧洲最好的头脑就这样失  
去了平衡。”

# 爱对她来说最重要

——叶卡捷琳娜二世

叶卡捷琳娜二世：俄罗斯女皇，彼得大帝的继承者。在她统治的时期俄罗斯国家巩固，疆界扩大，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四十岁时，认为自己更加健康强壮、活力充沛、积极乐观。她坚信自己以及自己在政治上作出的正确决策。当这位刚刚四十岁的女皇收到哲学家伏尔泰从示范园寄来的赞扬她开明政策的信时，她回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叶卡捷琳娜对他表达了谢意并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他对自己的赞扬。“先生，您的国人并不都像您这样看我”，她在信中这样写道，“有一些人认为，我不会有有什么好的作为”。这位出生于德国的公主、如今的女皇、“全俄罗斯人的统治者”展示了自己的优点：“您在信中说，您在我所做的众多事情上与我有共

识,您对我所做的这些事也很感兴趣。您知道,我美丽的殖民地萨拉托夫州共有 27000 多人,可是它没有受到土耳其人或鞑靼人入侵的威胁;《科隆日报》对此有过报道。每个区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和礼拜;每个人都在和平的环境下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且 30 年免交捐税。

“另外,我们这里的捐税是如此之少,以至于俄罗斯所有的农民都衣食无忧。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甚至有这样的地区,那里的农民喜欢火鸡胜过喜欢家鸡。买卖粮食在一定的限制下是允许的,虽对一些滥用情况有预防措施,但决不会对阻碍贸易的发展。价格提高了,农民种植的田地也在逐年增加,七年来许多地区的人口增加了大约十分之一。当然,我们还有战争,但是俄罗斯人民认清了形势,就是国家摆脱战争后比战前更加繁荣;国家有了自己的法律,才能快速发展。这个工作正在缓慢进行之中……法律应该宽容,不应有人受迫害、被杀死或被烧死。”

叶卡捷琳娜于 1729 年 5 月 2 日生于施泰廷,是普鲁士公爵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冯·安

昂哈尔特-策布斯特的女儿。这时的她已经作了五年的俄罗斯女皇和“全俄罗斯人的统治者”，但她此前的道路并不平坦。十五岁时她赴俄国与那位心理发育不健全的王位继承人结婚。1762年她的丈夫被加冕为彼得三世时，叶卡捷琳娜却利用近卫军团，推翻了他的统治，并同时宣布自己为女皇。

叶卡捷琳娜受过较高的教育，她深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这场思想运动的领袖伏尔泰的影响。她一生都致力于写剧本，确实也写了很多。启蒙运动期间，她在许多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可是她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影响——那时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做了激烈的抵抗。

叶卡捷琳娜对爱情的追求影响着彼得堡皇宫里的很多事，不过当时的报道过分夸张了。毫无疑问，叶卡捷琳娜在她的一生中有许多情人，他们的人数及影响已不能准确地追述了。真正有影响力、当然也很聪明、参与政治、在她的情人中很突出的一个人，是比她小十岁的格里高

利·亚历山大德罗维奇·波特金。像其他宠臣一样，他作为侍卫长进了皇宫，住在女皇卧室楼下的房间里。当时驻彼得堡的英国公使罗伯特·古宁曾将此事报告给了伦敦政府（1774年3月4日）：

“一幕新剧在这里刚刚上演。我认为，自她开始统治国家以来，它比其它任何事情更加引人注目。女皇的宠臣瓦西里契科夫先生对国家事务施加的影响力和赢得女皇的信任方面的能力都有限，现在有了一位接班人，他在这两个方面都很强。……波特金将军，他大约一个月前来到了这里，之前他在军队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据说，他在军队被所有的人憎恨。他身材高大，面部长相一点都不能使人有好感。至于他那鲜为人知的性格，总体上看起来比其他人更加知人善任、有更强的辨别能力……”

叶卡捷琳娜的新宠的确算不上英俊，英国公使说的没错。相对于年龄来说，他的身材过于肥胖，沉重的躯体上顶着一颗梨形的脑袋，长着一只扁平的鼻子。左眼没有了，是在一场打斗中



被打落的。他的手看起来缺乏保养,因为他有啃指甲的习惯。可是叶卡捷琳娜觉得他有魅力,她爱上了他。他搬进皇宫的那年,她四十四岁,他三十四岁。她第一次在她的生命中感觉到了在一个男人身上有她需要和寻找的一切,那就是他不仅是情人,而且是个非常聪明的工作伙伴。

对叶卡捷琳娜来说,爱是最重要的。无论什么时候,她总是和波特金在一起,她经常给他写情书,许多情书都被保存了下来。例如:“在认识了你之后,我还会爱上别人吗?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与你相提并论。我爱你胜过了我对永恒的爱。”

恰恰在这一点上,波特金不相信她。他生性抑郁,善嫉妒。他会因为叶卡捷琳娜以前的情人而醋意大发,他指责她有过15个情人,这是他过分夸张了。她为自己辩解,对他的指责写了一封长信来作解释,并称之为“真诚的坦白”。信中讲述了她在遇到他之前的生活,结尾写道:

“在坦白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希望你能宽恕

我的罪过？你必须弄清楚，不是 15 个，而是只有这个数的三分之一。第一个男人我是被迫的，”她对她的情人说，“第四个我是由于绝望才接受的，我相信你不会把这两个人归罪于我的轻浮。另外三个，如果你真能为我的处境着想，老天作证不能归因于我放荡不羁的生活，我并不是那样的人。如果我年轻的时候就找到真爱的人，我一定会很爱他，永远忠诚于他。”

有时候，她一天之内写好几封情书给他。信通常都很长、很详细：“亲爱的，我想，你一定以为我今天不给你写信了。你是在欺骗自己。我五点钟就醒了，现在是七点，我已经在给你写信了！……我命令我的整个身体，甚至一根细小的毛发，不再给你哪怕是最轻微的一点爱的表示。我把我的爱用十把锁锁在心里，任凭爱在心里煎熬，痛苦不堪。我害怕它会爆发。想想吧，你是一个有理智的男人，会有人这么傻，用这么简单的话来表达吗？完全是一股荒唐的潮水冲出了我的大脑。我不明白，你怎么可以忍受一个有如此荒唐想法的女人。哦，你带来了怎样的悲哀的



奇迹，一副被认为是欧洲最好的头脑就这样失去了平衡。是时候了，该是我重新恢复理智的时候了，多么丢脸！多么邪恶！‘他要因为你的这些发疯的想法讨厌你了，’我对自己说……”

有时候她只给他写几句话，一个匆匆写就的问题：“我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我的小鸽子，早上好。我最亲密的爱人，我想知道，你睡得好不好，你是不是也像我爱你一样地爱我……”

她不仅称呼这位高大魁梧的男人为小鸽子，她还经常发明新的昵称。她是她的小狗狗、她的小锦鸡、她的小猫咪、她的小鸚鵡、她的灵魂、她的小心肝，有时候还是她热带丛林中的老虎或狮子。波特金的传记作者，历史学家格奥尔格·索洛维奇克，以及其他俄罗斯历史学家都确信，在叶卡捷琳娜和波特金相爱几个月后，于1774年秘密结婚。虔诚的波特金对这种不合法的结合感到难堪。但是这种猜测没有确切证据，最多只有一些间接证据。这些证据是从许多信件中得到的，叶卡捷琳娜在他们的通信中称波

特金是她的“丈夫”，而称自己是他的“妻子”。例如：

“我的先生，亲爱的丈夫，首先我要回答的是，什么事情最令我感动？你为什么想哭呢？你为什么宁愿去相信你那种不健康的幻想，而不相信明摆着的事实？难道两年前神圣的纽带没有把我和你绑在一起吗？我不是从那时起在你面前改变了我的看法吗？我可能会不再爱你了吗？相信我的话。我爱你，我和你已经被无数根绳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四十六岁的叶卡捷琳娜写这封信，很明显是由于波特金又一次对他们之间的爱产生了怀疑。尽管她不断用那么多的昵称来称呼他，授予他很多奖章、勋章、官衔，赠予他礼物、金钱，尽管她愿意接受他本来的样子以及他有时几乎是抑郁、消极的生活方式，像冈察洛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奥勃洛摩夫预言的一样，他似乎总是在怀疑。波特金常常整天穿着睡衣躺在长沙发上，啃着手指甲——“我心爱的啃指甲的人”，叶卡捷琳娜曾经这样称呼他——冥思苦想，有时候像

着魔似的感到莫名的恐惧。叶卡捷琳娜正好相反,她做事比他有条理得多。这对于她必须胜任的巨大工作量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每天早晨她六点起床。当波特金穿着睡衣,尚未洗漱,进入她房间时,她已工作了好几个钟头。在很多方面她都过分敏感并非常注重宫廷礼节,但是却能在接见宫廷官员、大臣、来访者时容忍他就这样待在她身旁。

但是这位看起来似乎经常消沉的波特金,他的精力和权欲实际上不比叶卡捷琳娜逊色。因此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口角。终于,叶卡捷琳娜四十七岁时,他们协议分手。这是1776年,他离开首都,去外地长时间旅行。后来,他又回到彼得堡自己的住房,是叶卡捷琳娜送给他的。他对当时的重要的政治决策都有影响力,更奇怪的是叶卡捷琳娜甚至让他来决定谁应该成为她的下一位情人。他总是为她挑选比他自己缺乏野心、对他不能造成威胁的人。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

**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Fjodor M. Dostojewskij**

**1821—1881**

“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是  
疯狂的，疯狂的事，这是疯  
狂，疯狂！它首先是邪恶的，  
虚弱的，但是只要有一次机  
会……”

# 疯狂的赌徒

——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作家，代表作有《罪与罚》、《白痴》、《群魔》、《穷人》、《死屋手记》、《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俄罗斯诗人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出生在莫斯科一户贫穷的医生家里。在俄蒙边境服役期间，他匆忙而草率地结了婚，在新婚的前夜新娘还和一位情人在一起。婚姻并不幸福。直到四十岁时，他爱上了年轻任性、追求解放且爱好写作的波利纳·苏斯洛瓦，很快就迷恋上了她。他携她游遍了整个欧洲，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又沉湎于第二个爱好——赌博。

他希望一次下注就赢回很多钱。就这样，他开始了他的赌博生涯。他辩解道“我只不过是希



望在最短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多赢钱，这并没有什么不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获得很多钱，这样就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写作。他总是这样说。可是，运气并没有落到他的身上。相反，他却成了赌场的常客，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赌徒。

早在著名的蒙特卡洛赌场建立之前，即1860年到1870年间，德国是赌业的中心。当巴登-巴登、霍姆堡和威斯巴登的赌场面临关闭的危险时，蒙特卡洛赌场才开始营业。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2年在威斯巴登开始了他的“赌博生涯”。他和波利纳一起去了那里，而他那患了肺结核的妻子还留在彼得堡。刚开始他似乎很幸运，第一个晚上就赢了1万法郎，可就在同一天晚上又全部输光。第二天赢了3000法郎，他带着这些战利品去了巴黎，想在那里再赌一次，结果满盘皆输。

四十一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满脑子痴心妄想，他想并相信自己能靠赌博赢得100万，赢到钱后就准备洗手不干。这样，他们又回到德国，结果在巴登-巴登输掉了手头仅有的现金。他和

波利纳一起返回都灵，又将妻子寄来的钱输个精光。为了筹够回家的路费，他不得不当掉自己的手表和情人的戒指，最后两手空空地回到彼得堡的妻子身边。因为莫斯科的气候有益于他妻子的身体健康，他们一起移居到了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写了《死屋手记》，描写了一个背井离乡的人——其实就是他自己——对新环境的不适应。

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他的这篇《死屋手记》的时候，妻子去世了。不久，哥哥也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寡妇和四个孩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有义务肩负起养活嫂子和孩子们的责任。就在这时，他创办的杂志停刊，他承担着15000卢布的巨额债务。在这样悲观的前景下，他又一次来到欧洲，来到德国，他想在那里再见到波利纳，也为了赌钱。首先他必须为这次旅行筹到足够的钱。他以3000卢布的价钱将他所完成的小说的出版权卖给一位出版商，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截止到1866年再交出一本小说。他用这3000卢布中的大部分还了在莫斯

科欠下的债务。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剩余的钱来到威斯巴登,直奔赌场,很快就全部输光。他不得不向在威斯巴登遇到的朋友和熟人借钱。在给已经离开威斯巴登去了巴黎的波利纳的信中他写道:

“你离开后的第二天,旅馆就通知我,说他们不再给我提供食物、茶和咖啡。我要求他们做出解释。那个胖店主告诉我,我不配获得食物,以后除了茶,不会再给我任何东西。从昨天起我一顿饭也没吃,能够吃到的只有茶,就连茶也是最差的一种……对德国人来说,没有比不能及时付账更大的罪行了。如果再没有人给我寄钱,我将面对很大的麻烦:他们会拿走我所有的东西,把我撵出去,或是比这更糟……”

当他终于收到一位朋友从俄罗斯寄来的钱时,他离开德国返回家乡,并开始了长篇小说《罪与罚》的创作。这期间,他还口述了一部小说《赌徒》——这得益于他对赌博的迷恋。为他做速记的这位速记员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携她做了他的第三次、也是他时间

最长的一次欧洲旅行。1867年他们来到柏林，后来去了德累斯顿，妻子安娜就留在那里。他却去了霍姆堡，又一次去赌场碰运气，但他再次输光了所有的钱。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妻子要钱，他对自己和自己的运气彻底失望了。

“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是疯狂的，疯狂的事，这是疯狂，疯狂！它首先是邪恶的，虚弱的，但是只要有一次机会……该死的，我必须停止！”

四天之后，他写道：“你一收到这封信，就马上，一分钟都别耽误给我寄20塔勒来。就在我收到信的当天，就在那一刻。不要浪费一秒钟。这是我最后的请求。我想先赎回我抵押了的手表，然后支付住宿费，还有路费，剩余的我会全部带回去……”

又过了三天：“安娜，我忠诚的人，我的女友，我的妻子，原谅我，不要骂我是骗子，我犯了一个错误，我输光了你寄给我的所有的钱。——所有的，直到最后一个十字币。昨天我收到的你寄的钱，昨天就全输光了……请立刻寄些旅行用的钱给我，哪怕那是你最后仅有的一点钱。”

这是她最后仅有的钱！可这不是他最后一次赌博！安娜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必须保护他，不让他再受到伤害，不是为别的，是因为他没有一点儿自制力。他发誓，甚至用名誉作过保证，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有一次，我们的钱存到了 168 金币，这都归功于我把钱保管起来。我每次只给他 5 个金币，否则他会在巴登-巴登的第一天就全部输光。”

可是这种方法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他们到没有赌场的日内瓦旅行也不起作用。他在那里乘车到了瑞士的赌场萨格松，在那里又输了，并通知他妻子：“安娜，我亲爱的人，我比一只动物还要可怜。昨天晚上快到 10 点的时候，我赢了 13 万法郎，可今天连一分钱也没有了。我赢回了一切，接着又输了一切。”哦，我的天使，不要生气，不要悲伤。要相信，那一刻就要来到了，那时我会让你挽回尊严，我不会再像个卑鄙的、低贱的小偷抢劫你！……我抵押了我的戒指和冬天的大衣，我输掉了一切……”

他们在国外待了很多年，生了两个孩子。这

段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在写作、赚钱。可是,他远远没有摆脱赌博对他的诱惑。有时,他们没钱买食物。时年四十八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当我饥饿难忍,连裤子都抵押掉的时候,我怎么还能工作?而她,我妻子,正在给孩子喂奶,她也不得不自己去当铺当掉她最后一件保暖的棉衣,而恰恰这两天在下大雪……”

在一次轮盘赌中,四十九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他给妻子(1871年4月28日)的信中写道:“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永远不会有下次了。你相信我吗?安娜,现在我的双手自由了。赌博对我是个枷锁。现在我要考虑我的工作,决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夜地沉湎于赌博。”

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他的传记作家杨格·拉夫林所说——遵守了他的诺言,在他余生的10年里没有再去赌博。



克拉拉·舒曼

Clara Schumann

1819—1896

“我在人世间所得到的  
快乐足以抵消所受的痛  
苦——我还有许多快乐的  
事情。”

# 抚养七个孩子的音乐演奏家

## ——克拉拉·舒曼

克拉拉·舒曼：德国女钢琴家、作曲家，作曲家罗伯特·舒曼之妻。曾在法兰克福霍赫音乐学院任教，作品有钢琴协奏曲、歌曲及钢琴风格小品等，并编订出版了丈夫的作品集。

1859年9月10日，二十六岁的约翰·勃拉姆斯在给他尊重并深爱着的克拉拉·舒曼四十岁生日的贺信中写到：“亲爱的克拉拉，我为你9月13日的生日送上我最衷心的祝愿和几首乐曲作为礼物。希望你能从中听到最美好、最能表达爱意的心声；我想，你能听出一份真挚的感情和一颗热爱的心。让音乐来表达吧，不要再想了，给我爱吧……”在回信中，她向他表示感谢：“收到你的生日贺信我非常高兴，亲爱的约翰，你的信到达时是十三日的傍晚，我正独自坐在



窗前眺望落日。”

克拉拉·舒曼独自度过了她四十岁生日的夜晚。也许她在思念罗伯特·舒曼，多年来她经常这样度过(这在她的信和日记中提到过)。19年前，在她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她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毅然与当时三十岁的罗伯特·舒曼结了婚。14年后，舒曼病倒了，突然不会讲话，出现幻觉，并企图自杀。他自己坚持在一家神经病院接受治疗，两年后在那里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克拉拉·舒曼在她的艺术生涯中，在音乐中，尤其是在她丈夫创作的音乐中找到了生活的支柱，并度过了舒曼去世后那段悲伤的时光。勃拉姆斯经常帮助她，在舒曼去世后写信给她：“你必须振作起来，不要让你的忧郁超越一切，永无止境。生命是宝贵的。你现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会摧毁身体，别说自己的生命已没有多少价值。不是这样的，只有极少数人是这样的情形……”

但是，她必须一个人面对很多困难。悼念五十五岁的歌手威廉明妮·施罗德-德夫里恩特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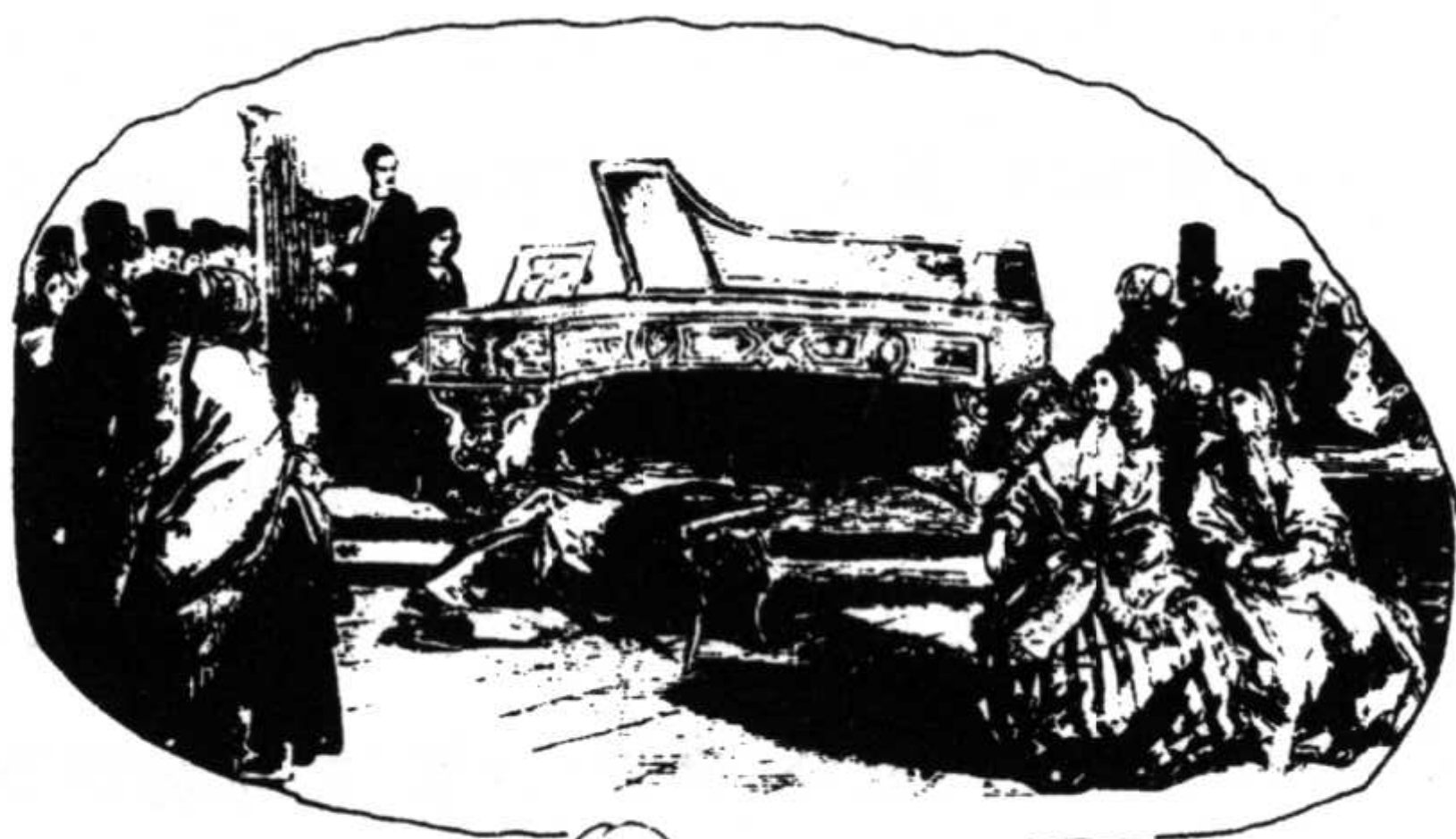
世后，四十四岁的克拉拉在日记中写道：“这个消息深深地触动了我……作为歌手，她无法忍受自己不再受欢迎的事实。但愿上帝可以免除我受这样的痛苦。如果再也不能全身心地去搞艺术创作，对我来说那将会是怎样的不可名状的痛苦啊，所以一定不能变老！只有一个人，只有为了他，我希望自己变老；我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了我心爱的人，为了他，我可以放弃我的艺术才华；我理解他的艺术和他的整个世界，我感到我的内心非常充实。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别人经常劝我说，你还有孩子们！的确，作为一个母亲，我感觉到有一条强有力的纽带，这条纽带现在还把我束缚在地球上。但是这时间是有限的，等到他们长大，没有我也能在世界上生存，因为不久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自己的路，我只能在垂暮之年孤孤单单地生活！”

但离这一天还远着呢！四十多岁的克拉拉还必须努力工作，帮助自己和孩子们度过困难时期。为了抚养孩子们，她必须参加许多巡回演出，同时她也喜欢这样做。勃拉姆斯有一次在给

她的信中说,她举办了太多的演奏会,也应该为自己的健康想一想了。她很吃惊,也有些失望,更难以接受偏偏是勃拉姆斯这么说她。在他写这封信责备她时,她正演奏着他的作品。1861年2月13日,她在回信中说:“亲爱的约翰,请别以为我办了那么多场音乐会是因为我想要多存些钱。替我想想,我还有七个孩子要抚养,其中五个正在上学读书,他们明年冬天都要回家来。你知道我的想法,我想让他们尽可能多地享受他们的青少年时期,不是懒惰,而是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就这么多。孩子们的开销逐年增加。如果他们在二十岁之前能自己赚钱的话,我就非常地幸运了。年龄小的孩子们需要更多钱,单单是音乐课就已经花费了很多。你知道现在的音乐课的费用是多少?此外,难道我不应该考虑一下我的将来吗?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难道要我为每天的面包担心吗?或是要我依赖我的孩子们?无论怎样,我都会爱惜我的身体,尽量少受累。可是,勤奋的人最终不就是把他的生命交付给他的事业吗?我不是夸张,因为内心的朝

气和热情令我觉得自己不再疲惫,相反,比 20 年前还要年轻。我想,一种宁静的生活只能让我的烦恼占有更大的空间。”

不只是经济问题需要解决,经济问题在她当时所处的情况下看起来是最轻的。作为著名的女钢琴家和贝多芬、肖邦、舒曼、勃拉姆斯等音乐家的作品的著名演奏者,克拉拉已为世人所认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赞扬。然而,她的孩子们的问题使她不知该怎么办。她在 1861 年 7 月 15 日给勃拉姆斯的信中提到:“孩子们给我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担忧令我如此沮丧,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主意。对于一个没有男人帮助的妇女来说,这个负担太沉重了。特别是男孩子们,对于他们的生计我一点建议都给不了。路德维希不能继续待在公立学校里了,必须和在文理中学上学的费迪南德分开。这对他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那么去哪里呢?有人建议,让他去乡下的牧师那里,他必须增强体质。可是去哪里才能找到与之相匹配的条件呢?如果我能一次把所遇到的问题都讲给你听,那该多好。也许你



会给我一些建议——我是多么不情愿带着一副阴沉沉的面孔，进入你那温暖舒适的带着阳台的房间。”

但是，这位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又能给她什么建议呢？他有他自己的烦恼，这时他正在准备赴维也纳，离开那幢易北河边上带阳台的别墅。他为没有能够担任家乡的汉堡交响乐团的总监而伤心。为此，克拉拉说了很多安慰他的话。他离开汉堡不久，她随后就在那里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她在汉堡写信给他：“很少有艺术家有幸在自己的家乡成名，这的确令人难过！可是，你还这么年轻，亲爱的约翰。你会找到一个可以使你大有作为的城市，‘娶一个可爱的妻子，每个城市都有一片天空’。这是我丈夫在一首充满了柔情的小诗里写的。你一定会找到家庭的幸福和故乡——找回一切！……”

克拉拉准备在巴登-巴登小城置办一处固定的住所。她在1862年8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去看了一处房子，觉得挺满意，就出了价钱。冬天我一般都在巡回演出。到了夏天，我可

以拥有一座固定的住所，孩子们也可以暂时陪在我身边，那该是多么好啊。我至今还过着飘荡的生活，不知道夏天又会去哪里，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有家的感觉，既没有时间也不能专心地坐下来学习。如果我在巴登-巴登购置了房子，我不仅可以享受到美丽的自然风光，而且可以和那里的艺术家有更多的交流，也许会觉得社交太多了点儿。这里是艺术汇集地啊。”

不久，她就搬进了那所房子。她用了好几个月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了布置。1863年6月14日她写信给勃拉姆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房子终于布置好了。虽然比较小，可是很可爱，也很舒适。整个房子都按照我的设想布置好了，每个孩子（大一些的孩子们）都有一间自己的卧室，有了自己的小天地。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开始注重家政理财了，尽管我做这一切并不像当初为罗伯特料理家务那样快乐。我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们在这里感到舒服快乐，让他们怀着更大的兴趣学习。是啊，你见到过非常美丽的地方，你可能不会注意到我的房子，因为它

比别的房子矮小,从外面看像一间农舍,但里面可不是农舍。我有三架钢琴——地方是足够了。”

四十多岁的克拉拉继续参加巡回演出,从欧洲不同的城市写信给勃拉姆斯,告诉他她的演出情况和疲惫的旅行。例如:“彼得堡 1864 年 3 月 10 日:这次旅行先从科尼斯堡(现名为加里林格勒)到里加,然后再到这儿,太累了。在第一段的旅行中我病得很厉害,一到里加就卧床不起,饱受了病痛的折磨。尽管如此,我却以超常的毅力和耐力完成了我的音乐演奏。我是从哪里得来的这股激情,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从中得到了很多快乐,到处都有罗伯特的崇拜者。我可以这样说,罗伯特的作品是属于他们的,和他们在一起,我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这次俄罗斯巡回演出结束后,她又回到德国。在 1864 年 6 月 1 日的信里她写道:“我在俄罗斯演出取得了成功。考虑到目前那里的经济状况,我觉得很满意。如果是在德国我不可能付出那么多,演出非常辛苦。比如说,从莫斯科乘



车 20 个小时,早晨 9 点到达彼得堡,11 点就开始排练,接着晚上演出。然后连续三天,每天一场。”

比这次更加劳累的演出,是她讲述的一次英格兰之旅。当时克拉拉总是担心,自己也许不能再演奏得那么好了,因为她经常感到手指关节痛。当勃拉姆斯在第二年——像前一次那样——写信说,她不应该再做那么多的巡回演出时,她觉得特别难受和伤心。她当时又一次去伦敦巡回演出,从她自伦敦寄来的回信中可以猜测到,勃拉姆斯甚至建议她无论如何也要停止演出。1868 年 3 月 19 日她回信道:

“看来你原来一直以为我生活得太舒服了,为了消遣才去巡回演出。怎么能把这样的劳累看成是消遣!我现在的事业是如此成功,即使不是这样,现在也不是我停止演出、退出公众舞台的时候。这几年来,我到处被观众的热情所包围并备受他们的欢迎,每场演奏会都是座无虚席。除了偶尔几次例外,我演奏时总是非常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恰恰是现在要停止我的演奏生

涯。我不明白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演奏,该不会是那些不受欢迎的评论家吧?只有专业艺术家才能对我进行有权威的评价,正是从他们那里我才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快乐。他们向我保证,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听到我如此优秀的超越了作品本身精神的演奏。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对我说好听的话,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如果说,我不该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例外,以为自己会永葆年轻,那么你这种指责是错的,我根本不值得去辩护。你清楚地知道,事情不是那样的,因为我经常在这件事上反驳你。我会去考虑你的话,但我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对我说出那些话,你的那些话使我不安,使我几乎丧失全部力量。然而,我从我广大的听众那儿获得支持,获得力量。他们给了我自信和勇气。你的话实在是欠考虑,再多的我也不想说了。”

七个月之后克拉拉再次提到勃拉姆斯对她的看法。1868年10月15日她从巴登-巴登给他写信:“你对巡回演出的看法令我感到很奇

怪！你只把它看成是赚钱的手段，我不是。我觉得我负有重新演绎那些优秀作品的使命，特别是罗伯特的作品。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这样做，只要有精力，我就会去巡回演出。只是不会再以这种过分劳累的方式。艺术表演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不久，已经五十岁的克拉拉向勃拉姆斯承认道（又是从伦敦寄出的信）：“我被热情的听众接受了，尽管有各种恐惧，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地弹奏。胳膊和手指的剧烈疼痛折磨着我；几乎每天都会带给我一种新的恐惧，它总是飘然而至。我在一场接一场的音乐会上，尽可能地珍惜和保重自己的身体，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孩子们不断地给她增添忧虑和制造麻烦。首先是大儿子路德维希，他给她添了很多苦恼：“我必须把路德维希送往疗养院，此外再没别的办法了，因为他不能独自生活，也不听任何人的话。”想到她丈夫的病，她补充道：“命运真是残酷，赋予我两次这样的考验。”她已经准备好了接受这样的考验：“我已下定决心，在内心里默

默忍受,我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力量,我必须抚养其他的孩子。我在人世间所得到的快乐足以抵消所受的痛苦——我还有许多快乐的事情。”

克拉拉·舒曼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有 25 年的寿命。大约在舒曼去世之后,她就不再作曲了。但是,多年来她一直进行钢琴演奏表演,尽管胳膊和手指经常会疼痛。1878 年到 1892 年间,她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一所音乐学院当老师。她和勃拉姆斯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她离开人世(1896 年 5 月 20 日),勃拉姆斯比她小 13 岁,但是只比她多活了一年。



勒内·玛丽亚·里尔克

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

“何时能有一位神有足  
够能力来减轻人们的痛苦，  
来抚平整个欧洲的巨大伤  
口！”

## “美化英雄”的反战者

——里尔克

勒内·玛丽亚·里尔克：奥地利诗人，20 世纪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祈祷书》、《杜依诺哀歌》、《旗手克利斯朵夫·里尔克的生死曲》等。

对于 1875 年 12 月 4 日在布拉格出生的过分敏感的诗人里尔克，跨入生命的第五个十年意味着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折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刚刚四十岁的里尔克不得不应征入伍。1915 年 5 月他在第一次体检时就不合格。六个月后，即他四十岁生日前十天，在慕尼黑再次进行入伍体检，医院的鉴定证明他有肺病，但他还是被宣布“适合加入武装的战时后备军”。1916 年 1 月初，已经以《旗手克利斯朵夫·里尔克的生死曲》(1906 年)而出名的诗人作为“编外战时后备军”赴维也纳，加入了国防军保

卫一团。

里尔克从一开始就反对战争。早在 1914 年 8 月,当时许多人正沉迷于爱国者的疯狂中,他对此却持着冷静、怀疑、拒绝的态度。现在,战争已经持续了两年,他不禁问道,这场战争难道必须继续进行下去?“没有人能阻拦或制止吗?为什么没有两个、三个、五个、十个人一起站起来,高喊:够了!他们可能会被枪杀,可能会为阻止灾难付出生命。够了,战场上的生命正被摧毁,该有人站出来阻止这些恐怖事件继续发生了……”

一年前,他在写给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士的信中说道:“您一定要相信我所说的,一年来我艰辛地、一步一步地穿越了不可想象的荒漠和痛苦。我遭受的痛苦不是别的,而是我通过行动也不能减轻的那种痛苦。因为我,我只能为大家而战,不能为反对谁而战。何时能有一位神有足够能力来减轻人们的痛苦,来抚平整个欧洲的巨大伤口!”

里尔克的父母希望他以后成为军官,所以

十岁时就把他送到军事学校，并在那里生活学习了五年。后来他把这段时间称为“恐怖的初级教育”。四十五岁的里尔克在给一位军官——以前是那所学校的一位老师，他还记得这位当时已经很出名的学生——的回信中写道，他儿童时代的那五年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残酷，他力图将那段经历从他的记忆中清除。

“如果我不是这几十年来力图清除对那五年的军校生活的回忆，那么我想，我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可以称之为幸福的生活。是的，我费了多大的努力去抹除那段记忆呀！曾有时，甚至一点点对可怕往事的回忆都会瓦解掉这个我为之奋斗的新生的、有成果的、独特的意识——我必须强行去摆脱它，就像摆脱一种陌生的、不熟悉的生活……我觉得我更加自我封闭，更加自我保护。那远远超出了我当时年龄所能承受的巨大灾难，在我看来仍然是不可理解的——我无法明白童年时期遭受的无法理解的厄运，同样也不明白自己最后怎么能奇迹般地摆脱了这个厄运。”



里尔克给一位将军、他当年的老师写信,讲述那个“十岁、十二岁、十四岁的孩子的绝望”。这位四十五岁的诗人充满怨恨地写道,他最后成了一个“精力耗尽、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伤害的人”才离开了那所学校。十六岁时,由于健康原因,父母最终允许他离开军校。这至今他还称之为奇迹。接下来的一年,他是在病痛折磨和一筹莫展中度过的。里尔克在家庭教师辅导下准备毕业考试,二十岁时,他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他先后在大学学了文学史和艺术史以及法学史,但都没有结业。期间,他发表了一本诗集,去了很多地方旅行。1901年与沃普斯威德的女雕刻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结婚(他们有个女儿露特),但不久便离婚。然后,里尔克又开始继续他居无定所的旅行生活。这些住处都是他的崇拜者们提供给他的。这位崇尚自由的学者、不能忍受固定环境约束的诗人,在四十岁时被迫入伍。

由于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费迪南德的一位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里尔克获得免服兵役的证明书。证书从慕尼黑寄给了当时已在

维也纳兵营报到的里尔克。但是，在维也纳，里尔克无法尽快找到可以递交这份证书的主管部门。这样，如他所写的一样，不得不穿上了一件破旧的“布满窟窿的制服”，背着枪和行装，经受了三个星期的野外训练，他称之为“受驯”。

这短暂的新兵训练对里尔克来说却是非常艰苦的，主要是他的身体几乎无法承受这种强度的训练。在一次训练中他昏厥过去。除了身体的摧残，士官们还在精神上对他加以折磨。至于他后来如何被候爵夫人玛丽·冯·特恩与塔克西斯从新兵连拯救出来，作家里西格弗里德·特莱彼茨是这样记录的：

“你叫什么名字？”穿着帆布裤子、脸色苍白、饱受折磨的诗人回答：“勒内·玛丽亚·里尔克。”“什么？”长官冲他大喊道：“你想让谁相信，你叫玛丽亚？男人什么时候叫玛丽亚了？我看应该叫你米奇！你看上去也只配叫这个名字。”里尔克很狼狈，尴尬地回答：“哦，我不是惟一叫这个名字的男性，卡尔·玛丽亚·冯·韦伯——著名的作曲家——也叫玛丽亚！”“我们不是什么作

曲家,我们军人得听命令。我建议你,去掉玛丽亚,就叫勒内·里尔克!”然后,他缓慢地从目瞪口呆的里尔克身边走过去。晚上,里尔克躺在草褥上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那位拿他的名字找碴并为他改名字的粗鲁的顶头上司对他大声喊叫:“下来,下来!米奇,练习操枪!前进!”里尔克无精打采地从上铺爬下来,没有持枪先受了训。这时,营房的门突然打开,霍恩将军陪同侯爵夫人特恩与塔克西斯走进来,室内顿时一片寂静。“这里有一位叫做勒内·玛丽亚·里尔克的人吗?”将军问上士。里尔克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看到了那位关心着他的命运的光彩照人的贵妇,顾不得应有纪律和程序,急忙跑到他的保护神面前。将军喊道:“这是个误会!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们迫切需要您到档案室!”

这段记载是否真的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暂且不做讨论。但当时,确实有很多朋友为里尔克四处奔走,说情疏通关系。他们中间有胡戈·冯·豪夫曼斯塔、卡尔·克劳斯、斯蒂芬·茨威格、出版商安东·科鹏伯尔格。他们建议,如果里

尔克必须服役,最好待在档案室工作。但是在档案室,对他来说几乎是更加糟糕,因为他显然得按照上面的意思撰写颂扬战争的记录,作为战争英雄的颂扬者。1916年2月15日他告诉他的出版商:

“在那里,我的工作环境(办公时间从9点到15点)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好得多,但是这种舒适却是无法忍受的,除非我完全适应这种机械的抄写和记录工作。那里的先生们已经做了一年半之久这种文书工作,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想象。我无法描述这种非常无聊而又有双重性的工作。这种错误的不负责任的滥用文字活动与军营里常见的对精神活动的排斥相比较,后者看来更令人羡慕。那些先生们把这些工作称为‘美化英雄’,开始很长时间,他们对此也很反感,现在他们已经克服了这一点,可以轻而易举地胜任这项工作。对我来说,面前一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他们不知道怎么和我交往,他们认为我生活在一种无形的懒散中,这是军队生活的经验。”

里尔克没有在档案室工作多长时间,1916年6月他就离开了部队。但是,多年以后他对那段经历仍然心有余悸。1920年1月已经四十三岁的里尔克回顾过去写道:“几乎整个战争期间,我总是在想,战争该结束了。这场疯狂的战争简直无法让人理解,简直不可理解。这个问题始终在我脑子里盘旋,占据了我的全部思维。”

复员后,他从维也纳返回慕尼黑,战后去了瑞士和意大利,在伊尔鹤河边的城堡里生活了一年,之后去了瓦利斯的穆佐古堡。在那个“难以想象的安静”的地方他(于1923年)完成了《杜依诺哀歌》和《致俄耳普斯十四行诗》。他并不知道,上天没有赐予他太多的时间。他再次旅行,又一次来到巴黎。在那里,许多新老朋友和崇拜者殷勤地招待他,为他庆祝,但他却突然地离开了这座城市,没有一句留言,也没有告别。连他自己都对他的举动都感到奇怪。在1926年2月21日的一封信中里尔克写到:“在巴黎我突然觉得一切是如此地令人讨厌,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我实在觉得讨厌。我的老朋友、最好

的朋友们令我疲倦，甚至是友情本身令我感到劳累，耗尽了我的力量。我不愿意，我不想……”

那年年底，即 1926 年 12 月 29 日，里尔克死于白血病，享年 51 岁。



**康拉德·阿登纳**

**Konard Adenauer**

**1876—1967**

“用理智和灵魂的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到创造性的工作中，这就是人类生命的最高境界。”

# 最年轻的市长

——阿登纳

康拉德·阿登纳：著名德国政治家，二战后，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

康拉德·阿登纳 1876 年 1 月 5 日生于科隆。大学毕业后，他先是进入一家律师事务所，后来被选入科隆市的管理部門，负责税务部门和人事部门的工作。一战爆发后，他还兼任了食品供给部门的工作。不久，他便预见到市民的给养早晚会成为问题，因此他为科隆的市民们贮藏了一批应急的食品。他让市区的绿化地全部种上蔬菜和水果，购置了 1 万只幼畜，租用了奥尔登堡、古默斯巴赫和瓦尔德不勒尔的牧场，还与两家食品厂合作，成功实验出用玉米粉、大麦粉和米粉制作面包，这种颇有名气的面包后来被称为“科隆面包”。后来，德国各地食品等物资紧缺的时候，科隆在整个德国是供给最充足的城



市。

阿登纳四十岁时，妻子因误食有毒蘑菇不幸去世，她为他生养了三个孩子（儿子康拉德和马克斯，女儿玛丽亚）。同年，即1916年，阿登纳因公外出，遭遇了一起车祸。当时他坐的汽车与有轨电车相撞。坐在后排的阿登纳在撞车的一刹那穿破挡风玻璃被甩出车外。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向阿登纳传记作家保罗·魏马尔这样描述那次事故：

“他的脸部受伤严重，颧骨和鼻梁断裂，下颧骨粉碎，牙齿脱落，上唇裂开……车祸使他的脸彻底破相。如果今天美国记者惊讶地发现，我父亲看起来很像一位上了年纪的印地安酋长，那么那场车祸就是整容手术。”

阿登纳也是这样认为，他有一次说道：“我这所谓的特型脑袋完全是那场车祸造成的。”这次车祸给他造成了轻度的视力障碍和困扰他终生的头痛病。

在战争的第三年，即1917年的秋天，阿登纳当上了科隆的市长。四十一岁的他是全德国

最年轻的市长。正如他多年以后承认,当时他感觉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就职之际,在为议员们所作的一场演说中明确地表明了他的信念:“用理智和灵魂的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到创造性的工作中,这就是人类生命的最高境界。你们通过选举我当科隆市的市长,为我打开了进行这项伟大工作的大门……我们的社会布满了创伤,到处都在流血。可是战争使我们睁开眼睛,我们看到我们应负的社会责任……消除社会各个领域的阶层差别是我们的责任。”

虽然时值一战最后一年,是一个困难时期,这位新上任的市长还是公开宣布了他的目标。他要把科隆,这座拥有65万人口的普鲁士第二大城市建成莱茵兰州地区最美丽的城市。他规划新建一个港口、市中心周围建造绿地并建立一所大学。但是,在当时这样的计划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用说在1918年革命以后了。阿登纳在半个世纪后回忆起这些时写道:“您几乎想象不到,革命来得如此之快,简

直就像一场儿戏,轻而易举地就成功了。因为,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已经腐朽,犹如空中楼阁,瞬间就破灭了。”

这位四十岁出头的科隆市长和普鲁士上议院的议员在1918年的革命中保住了他市长的职位,这一切都归功于他的执著和自信。当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在科隆夺取政权时,阿登纳静静地坐在他的市长办公室里,在市政厅内给他们提供工作场地。当约5000个被释放的战俘来到科隆,城里出现哄抢和袭击事件时,他向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毛遂自荐,让他负责城里治安。他的建议被采纳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任命他为“治安专员”,并给他佩了臂章和证件。证件上面写道:“持有人:市长阿登纳先生。住址:科隆-林登区,马克斯-布鲁赫街六号。证件持有者被允许白天和夜晚上街行走,行使他的工作职责。工人和士兵委员会的安委会要求各方,放证件持有人通行。科隆,1918年9月8日。”

阿登纳愿意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和革命者合作并获得成功。15年后阿登纳回忆起那

段革命时期：

“科隆处在悬崖边上……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逃避……我们的工作在社会民主党人士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就。1918年11月10日成立了由我领导的福利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相反，除了社会民主党外我们还有其它所有党派的代表。接着又成立了由所有党派和阶层的成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我们这支团结起来的政治力量成功地恢复了城市的和平与秩序，最后解散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拯救了军队，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恢复正常，为第六军和第十七军的顺利通过做好了必要的准备，确保部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莱茵河对岸。”

对阿登纳来说，这个生命中的第五个十年，是不平静的，却是成功的、有意义的、充实的。他四十二岁时再婚，四十五岁成为普鲁士国家议会议长。他1929年以一票胜出连任科隆市长，1933年被国社党分子免职，不得不暂时隐姓埋名。当他1945年又当上科隆市长时，已经是一位七十岁的老人了。



**玛丽亚·斯图亚特**

**Maria Stuart**

**1542—1587**

“我看到一只停靠在港湾里的船，被狂风和巨浪掀起，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

# 狂风和巨浪

——玛丽亚·斯图亚特

玛丽亚·斯图亚特：苏格兰女王，天主教徒，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软禁，后被杀害。

像阿登纳那样在四十岁时感觉自己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并对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满意的人并不多。大多数四十岁的人更有一种事业刚起步的感觉。苏格兰女王玛丽亚·斯图亚特的情况刚好相反。她十七岁时就成为法国女王，在法国势力的影响下她又获得了“英格兰女王”的头衔。但为此，她在二十五岁时便付出了失去自由的沉重代价。玛丽亚生于1542年12月8日。当她四十岁时，她已经被囚禁了十五年。在被囚禁的第一年里，她还可以在她的小院子里散步，有时骑马出行，进餐时甚至有十六道菜肴供她享用，在这里她只是没有自由。但没过多久，这种舒适的生活便受到限制，住处越来越简

单,最后终于变得十分简陋,几乎没有可行动的空间。她四十二岁时写的一封信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位昔日的法国女王于1585年9月6日给驻伦敦的法国公使写信,请求他的帮助:“现在我不得不迫切地恳求您的帮助,假如我不是像现在这样处于困境,我不会如此恐惧和担忧。我现在的处境是对我过去的行为给予的最重的惩罚。我住的房子离院墙大约只有六米远,地势非常之低,甚至低于院墙。院墙外的阳光根本无法照进来,房间没有什么通风设施,到处是潮湿和发霉的味道。我无法摆放任何家具,因为它们不到四天就会发霉腐烂。请您设想一下,这会给身体造成多么大的影响。用一句话来形容吧:这所房屋更像是用来关押坏人和无耻的罪犯的监牢,根本不能作为我的随从或者地位更低一些人的住所……我的住所由两个令人恶心的小房间组成。晚上是如此的寒冷,我不得不用我自己带来的窗帘和地毯把自己严严实实地裹起来,以此抵御寒冷,否则我一天都无法待下去。除了这两个只能看到荒芜的围墙的破旧房间,我没

有一个可以独自安静待一会儿的地方，那个大一点的房间面积不足三平方米。当我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而步行或被人抬上山时，只能看到四分之一摩根的土地(81 摩根=3000 平米)，这块地的周围被稀疏的灌木丛与四周的饲养棚隔开。看看这块地方吧，虽然名叫花园，可更适合养猪。至于说到外出，在漫长的冬季，雨雪把道路毁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我乘坐的马车都走不出一里……”

玛丽亚四十岁时，她腿脚已经很不灵活了。而以前她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她曾是一位出色的骑手，动作灵活而且有耐力，她还是一位狂热的猎手。玛丽亚曾被称为神童。虽然这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是她出众的理解力，她的早熟以及她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天赋是有口皆碑的。她精通多种语言：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十三岁时，她就自己起草了一份拉丁文的演讲稿并亲自演说。在演说中，她表明了妇女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同男人一样有能力的观点。在音乐方面她会弹古琴、



竖琴、琉特和斯宾耐琴，在艺术上她不满足于模仿，她还很自信，自己写诗。在文学、哲学、历史方面都很精通，她还花了很多钱买书和价值连城的字画。在她被囚禁的期间，看书、做诗成了她全部的生活内容。

她非常有魅力，很受男人喜欢，这使缺乏女人味的伊丽莎白非常地嫉妒她。玛丽亚·斯图亚特十五岁时和法国王位继承人，即后来的弗兰茨二世结婚。弗兰茨二世英年早逝，她于1512年返回家乡成为苏格兰女王并与表弟洛德·达恩利结婚。不久，两人便产生了矛盾，达恩利出于对玛丽亚的秘书弗洛伦蒂纳·里奇奥的嫉妒和仇恨而派人杀死他。（许多人认为里奇奥是玛丽亚的儿子雅各布的生父）不久，玛丽亚的丈夫达恩利遇害，人们猜测是被厄尔·博思韦尔——一位像许多男人一样为玛丽亚而着迷的人——所杀害，随后他成功地娶了玛丽亚。但是，这次婚姻使玛丽亚被怀疑参与了这次谋杀或至少知道内情。因此，达恩利的随从们反对他们的女王，终于强迫她让位给她的儿子雅各布。这样，玛丽亚

便逃到了英格兰，并希望在那位比她大七岁的表姐、1558 年成为英格兰女王的伊丽莎白那里寻求帮助。但是，亨利八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正致力于改变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使他们不再信仰天主教，而是转向信仰不依附罗马的由亨利八世创办的英国圣公会。伊丽莎白听从了大臣们的建议，未经审判就将天主教徒玛丽亚逮捕囚禁起来。天主教徒们把玛丽亚看作是惟一合法的女王，而且玛丽亚本人也公开宣布要求获得这一头衔，这样她自然就成了伊丽莎白的政治对手，伊丽莎白也就别无选择了。

玛丽亚给她表姐写了很多封信，但只收到很少的几封回信。那些玛丽亚请求单独见她的信根本就得不到回音。在 1568 年她写的一首诗中表露了这种请求（多年以后罗伯特·舒曼为这首诗谱了曲，成为第 135 号作品）：

### 致伊丽莎白

只有一种想法，令我欢喜令我痛苦，  
紧紧抓着我的灵魂，痛苦和甜蜜，

恐惧和希望的声音一起回响着，

这时我在不安地数着时间。

当我的心选择信使送出这封信，

我请您，看一看我的请求。

亲爱的表姐，我感到了新的恐惧，

因为它失去了证明它的权力。

我看到一只停靠在港湾里的船，

被狂风和巨浪掀起，

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

因此我也感受到了害怕和忧虑，

虽然不是害怕您控制我的不幸，

我所信任的锚缆已断去。

玛丽亚力图证明，她不是达恩利谋杀案的知情者、策划者和主谋。但是她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对方也无法证明她有罪，一切都悬而未决。玛丽亚被继续囚禁。她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给对方提供理由和借口。她的往来信件自然要被检查，他们竟然从她范围扩大的通信中发现她和国外的天主教徒勾结搞阴谋活动，主要是希望得到西班牙的帮助。

玛丽亚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令她原本就不自由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伊丽莎白曾两次允许她去布克斯通的温泉疗养，但是疗养丝毫不能减轻她的痛苦，更不用说治愈她的病痛。第二次疗养之后，已四十一岁的玛丽亚用拉丁文写了一首告别诗：

布克斯通，你温暖的泉水使你闻名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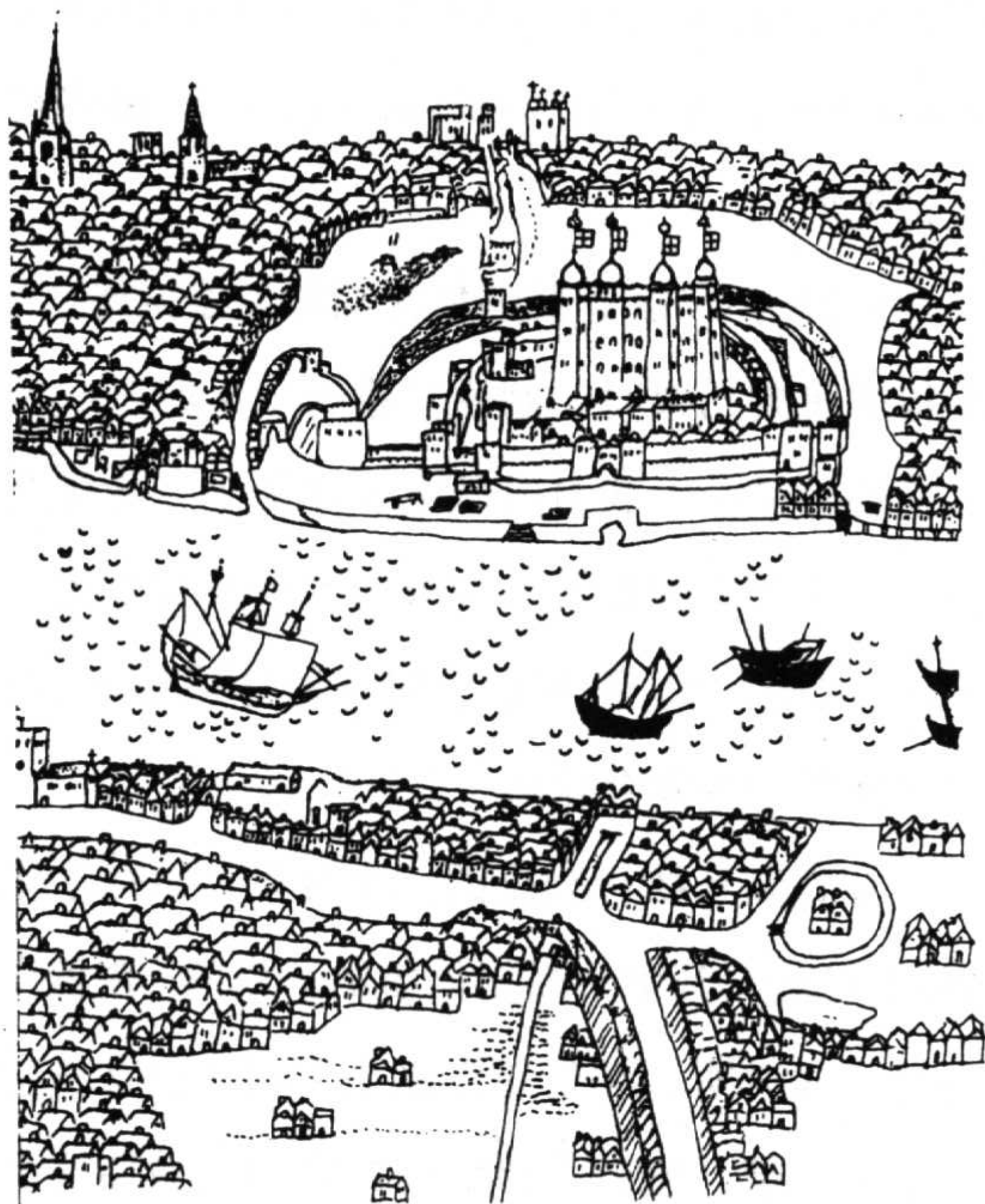
布克斯通，然而我却不会再来见你了。

她给法国公使写信，请求他们的帮助。当时，她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有时整天不能动弹。她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所受到的屈辱。“没有哪座房子能塞满了如此多的粗俗的人，即使他们想采取措施来保持基本的整洁，还是无法长时间地达到干净整洁。这里的住所同样如此，连个方便的地方都没有，到处臭气熏天，每个星期六必须清理一次。这些就在我的窗户下面，所以我没办法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如果不是表姐、伊丽莎白女王当初向我保证她会善待我的话，我是不会到这里来的。我太相信她了，所以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他们把我

从舍费尔德带到温费尔德，在隆冬季节又从温费尔德到这里。当时，我在床上无法动弹，几乎躺了三个月。这座荒废了十五、六年的城堡，他们只用了六个星期就匆匆收拾好，不管我是否同意，就把我扔了进来……”

玛丽亚还在信中抱怨到，苏格兰来的阿托女伯爵来看望她，可是他们不准她接见；“我不理解他们不让别人探视我的所谓充足的理由。也许他们担心她会把我儿子的消息带给我，以此来安慰我。如果他们还讲一点人道的话，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是母爱。虽然我和儿子相距甚远，但我对他的爱丝毫没有减轻。可是，他们剥夺了我与他交流的任何机会。……先生，我很惭愧将我的不幸如此详尽地向您描述，但目前的情形迫使我这么做。请您不要以语言来敷衍我，而是要通过行动来减轻我的苦难……您最好的朋友玛丽亚。”

尽管她的情形一天比一天差，但是玛丽亚没有放弃希望，她希望伊丽莎白改变对她的态度或是别人可能为帮助她做努力。的确，天主教



徒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起来入侵英格兰。有一天，她的密信被发现。这封信证明她过去的侍童安东尼·巴宾顿企图刺杀伊丽莎白女王，而玛丽亚本人对这件所谓的巴宾顿刺杀案并不知情。根据这些秘密信件（这些信后来被历史学家澄清属伪造或至少部分为伪造）四十多岁的玛丽亚被起诉，最终被宣判死刑。

审判时，玛丽亚被囚禁在福瑟灵盖城堡。当她得知审判结果时，她说：“我的一生就是一条不幸的锁链……我自愿踏上这片国土，希望英格兰女王答应帮助我。如果能允许我和她见上一面，交谈一次，我和她之间就能达成谅解，我们之间的矛盾就会化解。”

在宣判到执行判决的三个月里，她写了很多的诀别信，其中一封是给伊丽莎白的。在信中她再一次声明，对于那件谋杀伊丽莎白女王的事毫不知情。她请求伊丽莎白将她的遗体安葬在一个天主教区，最好葬在她法国的亲人那里。“因为在苏格兰我皇室祖先的遗体已被亵渎，天

主教堂也被玷污和毁坏了”。她很看重这个心愿，希望能得以实现。接着，她再一次提到这个请求并坚持要求得到答复：“如果您愿意满足我这个最后的心愿，请您命令他们给我一个书面的答复。否则他们会随意处置我，我希望得到你直截了当的答复。”

在结尾她这样写道：“我祈求怜悯与公正的上帝，愿他通过圣灵给你们启示，使我得到宽恕，像我希望的那样，没有痛苦地告别人世。愿他原谅那些置我于死地的人。我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我却感到了幸福，因为这免除我作为这个岛国所遭受灾难的见证人。这岛上的人们不再害怕上帝，也不再热爱上帝。虚荣和世俗的思考将不受控制和压抑。当我离开人世，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时，我提醒您——请不要指责我的自负——总有一天会有人要求您对您的所作所为负责。”最后，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你的表妹、非法被抓的囚徒、女王玛丽亚。”——这封信她仍然没有得到答复。

这张伊丽莎白开始不敢签署、最终还是签



署了的判决书,于1587年2月8日早晨在福瑟灵盖执行。尽管她想得到神父临终前祈祷的要求被拒绝,但四十四岁的玛丽亚直到最后一刻一直表现得很安详。刽子手的表现却非常糟糕,直到第三次他才把玛丽亚的头颅砍断。当他拎起那栗棕色曾被许多人赞美过的长发,向在场的人证明行刑完毕时,他手中只剩下头发,而头颅却掉在了地上。原来玛丽亚为遮盖她灰白的短发早就戴上了假发。

伊丽莎白没有满足玛丽亚最后的请求——将她的遗体运往法国,而是存放在了彼得堡主教堂里。在巴黎,亨利三世在圣母院为玛丽亚·斯图亚特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丧礼。玛丽亚十七岁时曾在这里加冕成为法国女王。与玛丽亚熟识的布尔特大主教以此结束他的发言:“噢,上帝!这是怎样的一个轮回?我们是不是永远都无法认清你,这人世间的短暂?噢,这骗人的伟大,难道我们永远都不能摆脱你了吗?”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pher Kolumbus**

**1451—1506**

“通向黄金和珍珠的路  
已被发现。可以相信,宝石、  
香料和不计其数的其它东  
西也将会发现。”

# 四十岁改变了整个世界

## ——哥伦布

克利斯托弗·哥伦布：意大利

航海家，新大陆的发现者。1492—

1504 年之间进行了四次远航，发

现了美洲大陆。

研究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汉堡历史学家埃格蒙特·策希林认为，在宗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之后最著名、最为世人所知的人是克利斯托弗·哥伦布。当他发现美洲时，他正处于不惑之年。他的这一发现使得人类历史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乘飞船到月球都成为了可能，所以美洲大陆的存在以及可以随时乘飞机去那里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几百年前美洲大陆还是块未被发现的、充满着冒险的新大陆。那时，哥伦布所做的一切显然被公认为是不平凡的。虽然布尔克哈特认为，“如果哥伦布在途中死了的话”，美

洲可能很快还会被其他人发现，但哥伦布的伟大还是在赫尔德、歌德、席勒、黑格尔、洪堡兄弟和许多其他人的作品或言论中得到证明。歌德表示，当时这一发现的不平凡性表现在：“毫无疑问，亚洲离我们更近了，近海航行已经不能体现冒险和勇敢的精神，这个葡萄牙人幸运的航行令全世界为之激动；但是这到底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将所有的一切都结合起来，将寓言与消息，幻想与传说变成现实。”

几乎和这位美洲发现者的名字一样广为人知的是，哥伦布当时并未想到横渡大西洋去发现一块新大陆。他的目的是要寻找一条到达印度和中国的更好走、更短距离的路。他不想像葡萄牙人一样，多年来按照航海家海因利希计划的线路，先向南环绕非洲大陆，然后向东北到达亚洲，而是走另一个方向，即向西穿越大西洋。哥伦布认为，向西这条航路要短得多。就这样他发现了美洲，这原本就是个意外。

很少有人知道，自己没有资金实施这个计划的哥伦布在寻求赞助资金时为什么如此困

难。这段故事很久以来一直被误传，特别是在教科书中。很多记载详细描述了当时三十二、三岁的哥伦布，为了赢得葡萄牙国王和大臣们的支持，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环球计划以及地球是圆的这新思想，哥伦布的行为又是怎样被他们嘲笑和讥讽的。国王和大臣们嘲笑道：地球是圆的？他们相信，站在他们面前的人一定是个疯子。

后来，哥伦布在天主教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国王夫妇的皇宫中也遇到了这样不被理解的情况。首先是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地球是个球体。所有的人都囿于中世纪对宇宙的认识，将地球想象成为一个很大的圆盘，为了避免突然坠入深渊，航海者们航行时应该远离圆盘的边缘。哥伦布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远远地走在了前面，虽然受到同时代的人的嘲笑和误解，但他终于通过行动驳斥了他们。

但当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哥伦布处于谬误当中，而他的批评者们有理由持怀疑态度。地球为圆球体——早在古希腊罗马

时期就被计算出来，只是暂时被遗忘了——在那时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哥伦布和葡萄牙专家之间争论的是地球的体积以及葡萄牙到印度，更确切地说是到中国的距离。那些海因利希学派的专家们完全立足于那个时代的地理知识。

关于这个距离问题，葡萄牙的约翰二世早在 1474 年（那时他还是王子）请教过居住在佛罗伦萨的医生及科学家波索·托斯坎内利，他是著名的数学家和宇宙志研究者。

托斯坎内利在 1474 年 6 月 25 日回答，穿越大西洋肯定比环绕非洲的路程短。不久，哥伦布也请教了托斯坎内利并得到了相同的答复，即 1474 年那封详细书信的副本。另外，托斯坎内利还做了补充说明：从里斯本横穿大西洋到达中国的距离相当于“地球圆周的三分之一”。“这条航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安全的”，托斯坎内利在给哥伦布的回信中补充道。

“地球圆周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是多长，这决定于地球的周长。对这个问题哥伦布和托斯

坎内利持不同意见。托斯坎内利关于地球周长的数字是正确的，它早就被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计算出是 39690 公里，(今天算出的正确的数字是 40075 公里)。埃拉托色尼在公元前三世纪主管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主要研究天文和地理。几百年后，即公元二世纪，同是住在亚历山大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对地球周长计算的结果是 28350 公里。哥伦布以这个错误的结论为依据，也许不是偶然的。

看起来似乎是哥伦布——正如传说中的那样——因为需要一位为他的航行探险出资的人并描述他的航行是可以实现的，故意将从里斯本到中国的距离估算错了。因为托斯坎内利指出，地球圆周的三分之一意味着 120 度时，哥伦布(没有为这个偏差列出任何原因)认为只有 78 度。就连托斯坎内利也远远低估了这个距离；今天我们知道，这段距离不是三分之一，而是足有三分之二的地球圆周那么长，也就是 229 度。哥伦布使这个错误变得更大，因为他接受了那个小的地球圆周的长度，算出赤道的经度只有 83.56

KOLUMBUS — HISPAÑOLA BESICHTIGEND





公里,而实际上却有 110.56 公里。

虽然人们不知道最关键的距离问题是否在葡萄牙专家和国王的枢密院讨论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至于计划流产,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这种可能的。因为那时,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派天文学家到赤道区,为了测量经度和计算地球的周长。显然葡萄牙人想准确地知道这个长度。测量结果使葡萄牙人增强了自己的信念,他们认为哥伦布的计划由于当时船的活动范围的局限,不可能实现——除非在这么长的航线上发现足够多的岛屿,从而不断地补充淡水和食物。

哥伦布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后来才证实,葡萄牙人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时已四十岁的哥伦布之所以得到了西班牙人的理解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必要的财力方面的支持,这首先是因为,与葡萄牙人相比,西班牙人在航海领域和海洋地理学方面完全是门外汉。开始他们也犹豫要不要同意哥伦布的计划,主要是因为他的要求过高,甚至对葡萄牙人来说都觉得这要求过高。哥伦布不愿意为一次性的

补偿去冒险,与天主教国王夫妇讨价还价,最后签定了合同并于 1492 年 4 月 17 日生效。合同内容如下:

“1. 授予哥伦布享有在航海中发现和占领的岛屿和国家的海军上将职位。哥伦布的有生之年及其他的继承人,永远享有这个职衔,并且和卡斯蒂利亚海军上将在他的领地一样拥有这些领地的一切优先权和特权。

2. 赐封他为在海洋中所发现、并获得的一切陆地和岛屿的副王和总督,他统辖下的地区的官员由他提出三个候选人,国王从中挑选一个来任命。

3. 授权 he 可以从所有在他的领地里生产、发掘和交换得来的一切黄金和白银、珍珠和宝石、香料以及其它任何种类的商品中保留十分之一。

4. 在上述地方和西班牙之间的商品交往过程中,一切诉讼和争执只能由哥伦布本人或其代理人来裁决。

5. 哥伦布现在以及将来为驶往上述岛屿和

陆地的船只提供八分之一的装备费，并享有由此获得赢利的八分之一。”

在签署了合同和一份正式、内容详细的、证明了国王授予哥伦布所有职位和官衔的文件之后的三个半月——哥伦布被允许在他的姓名前面加上了表示贵族身份的“堂”。1492年8月3日凌晨，这个小型船队从帕洛斯港口出发。船队共有三艘船：100吨重的旗舰“圣玛丽亚”号，60吨重的三桅轻快帆船“平塔”号和同样重的三桅帆船“尼娜”号。白色的船帆上面画着红色十字架，四十一岁的哥伦布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他们带足了一年用的食物，首先驶向加那利群岛。这次行动的经费是从国税中出的。至于王后伊莎贝拉抵押了自己的首饰来给予他经济上的资助，纯属传说。同样不足为信的是，传说船舰上的水手们是由“流氓和无赖”组成的。水手在当时是一种受人尊重的职业。另外，许多广为流传的水手公开抵抗海军上将的戏剧性的描写，也是不真实的。

在加那利群岛上为了修复“平塔”船用去了很多时间。1492年9月6日才得以继续航行。从这时起,他们的航行进入了未知的世界。哥伦布写了一本航海日志,后来交给了天主教国王。日志里记载了航行中发生的所有的事件和发现的岛屿,根本没有关于船员担心船会驶出地球边缘的纪录。很显然,船员们不再怀疑地球是个球体,他们只是担心回程的路途会太远。

哥伦布考虑到这种担心,从而隐瞒了他们航行的真实里程。他让他的人相信还没有走出太远,随时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返回。他在离开加那利群岛之后的第四十天写道:“我们航行了大约60海里,我决定在记录上比我们实际行驶的路程少算一些,这样即使旅程很长,我的水手们也不会失去勇气。”在10月1日的日志里他确定到此为止已行驶了2828海里,而他却告诉他的船员们只有2336海里。

尽管如此,船员们还是渐渐地焦虑起来。在10月10日的日志里哥伦布写道:“我的船员们开始抱怨起来,他们感到这么长时间的航行几

乎不能忍受。但我尽我所能去鼓励他们,告诉他们以这种方式努力取得的报酬就近在眼前了。我又补充道,现在来为是否继续航程而争吵是徒劳的,因为我本来就决定去印度,我必须继续航行下去,直到上帝帮助我到达那里。”

显然,哥伦布当时已估计到还有很长的航程;否则他会安慰船员们,回程的路比继续向前到达印度的路更长,需要更多的时间。两天后,也就是从加那利群岛出发的第四十七天,也就是从帕洛斯出发的第七十天,他们到达了一块陆地。这是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岛,今天的瓦特令岛。哥伦布给它起名为“圣萨尔瓦多”。哥伦布以为他的目的地西印度到了,确切地说是西印度前面的岛屿。他把这一伟大时刻客观地、冷静地、毫不激动地在他的航海日志中记下来。那是1402年10月12日:

“凌晨两点钟我们看到了大约八海里外的陆地。我们收起了其它的帆,只留下一张大帆继续向前行驶。然后抛锚停止航行,等待着天亮。这是个星期五,就在这一天我们到达了一

个岛……在那里我们立刻就看到了赤裸着身体的当地人。我在‘尼娜’号的船长马丁·阿隆索·宾松和他弟弟文森特·亚内斯的陪同下乘坐一艘有武器装备的小艇上了岸。在那里我展开了一面王室的旗帜……

这里马上就聚集了无数的小岛居民。我知道,对他们,用仁爱和使他们皈依我们的宗教比武力要有效得多。我把他们当成朋友,送了他们一些小红帽和玻璃珠项链,以及一些其它不值钱的小东西,这使得他们非常高兴。他们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多么令人高兴啊。他们泅水来到我们的船上,带来鹦鹉、棉花纺成的线团、矛和很多别的东西,和我们交换一些玻璃珠、小铃铛之类的东西,他们慷慨拿出他们的物品,同时收下我们带来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他们什么都缺。

他们不管男女,全都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我所看到的人都很年轻,年龄不超过三十岁。他们发育得非常好,体形匀称、相貌俊美,头发浓密而蓬乱,几乎可以和马鬃媲美……他们中间

有人用灰色涂满全身（他们和加那利群岛的土著居民相似，皮肤既不黑也不白），而另外一些人用红色、白色或其它颜色涂抹；有的人只涂在脸上，眼睛周围或鼻子，其他人则涂满了全身。他们没有武器，也从来没见过武器；我拿剑给他们看时，由于无知他们去抓刀刃，割伤了自己。他们没有铁器，矛是没有铁矛尖的木棒，上面装的是鱼齿或别的硬东西。他们体格强壮，行为勇敢，有些人身上有伤痕。我用手势比划着问他们是怎么受伤的，他们也比划着告诉我，附近岛屿上的人常来此岛想征服他们，他们要进行自卫。我觉得是那些人想抓他们去做奴隶。他们肯定能成为忠诚、聪明的奴仆，因为我发现，他们很快就能重复我说过的话。他们好像也不属于任何教派。如果上帝同意，我会在返航时带六个男人一起走，把他们献给陛下，教他们学会加那利人的语言。在这个岛上，除了鹦鹉我没发现任何飞禽走兽。”

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寻找黄金。寻找这种价值昂贵的金属是整个探险的原因之一。有了黄

金就可以继续与那些异教徒进行战斗，可以使天主教国王在对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他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我非常仔细地观察当地的一切，想努力搞清楚，这地方究竟有没有黄金。我注意到几个男人在鼻子上打了孔，孔中间穿着一节很细的黄金，我借助于手势了解到，在南边有一位国王，他有很多用黄金做的器皿和很多金条。”

四十岁的哥伦布不断地打听黄金的消息。他确信，他一定能“靠上帝的帮助找到黄金的蕴藏地”。哥伦布以为自己到了印度，所以称当地土著居民为印第安人。他们给他讲述有关黄金岛的事情。日志记载说，“其中有个人居然声称，有一个岛上全都是金子。而其它岛上也有很多黄金，那里的人把它们收起来用筛子筛，来去掉里面的沙子；然后高温融化，做成金条或别的东西，金条形状像他的手指一样粗。”

这样，哥伦布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设法使自己受到当地土著人的欢迎。他发现了古巴，接着又发现了海地。他们用从西班牙带来的玻璃



球和黄铜做的小铃铛从慷慨大方的印第安人手里换来了黄金,然而数量并不多。“黄金的原产地”显然还没有找到。

哥伦布不只梦想这些,他还一直想着传教:“我相信,我们的牧师掌握了他们的语言,向他们布道,他们就会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所以我希望尊贵的国王陛下尽快派遣他们来这里,使这里的人皈依天主教,使他们处于教会的庇护下……”

1492年的圣诞节,三艘船舰中最大也最笨重的“圣玛丽亚”号撞上浅滩,船吃了水,无法挽救。虽然没有人员的伤亡,而且借助印第安人的帮助把船上所有的东西都转移到了岸上,但是哥伦布已经不可能把所有的船员再带回西班牙。因为三桅帆船“平塔”号被船长马丁·阿隆索·宾松所控制,他想自己去寻找黄金,这样,哥伦布就只有一艘船可以使用,就是“尼娜”号。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就为西班牙建立了一个殖民地,他把39名船员留在了那个岛上。他说,很多人是主动要求留下来的。

哥伦布给他们(当他第二次来到这岛上时,没能找到一个生还者)留下了饼干、葡萄酒和弹药后,就准备返航回家。1493年1月4日“尼娜”号出发了,不幸的是在途中遇到了风暴。哥伦布担心再也回不了西班牙,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成果。所以,他把他旅途的发现写成了一封短信,署上了国王的地址,然后他把信塞到一个不漏水的圆筒里,像一只漂流瓶扔进大海。但是,他们在风暴中活了下来,于2月15日看到了陆地,就是亚速尔群岛。

1493年3月31日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四十一岁的哥伦布凯旋归来,驶入塞维利亚,从那里奔向巴塞罗那的皇宫,沿途的人们向他们行注目礼,大声欢呼。六个印第安人,头戴金色面具,一手持鹦鹉笼,一手握标枪,身上还挂满了其它装饰品,走在哥伦布身后。当他接近巴塞罗那时,皇宫的卫队和城中无数的居民都簇拥到城门前,迎接他的胜利归来。国王和王后正在皇宫大厅等候他,当他进来行礼时,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扶起他,吩咐他坐在他们身边。哥伦布

受到了空前绝后的尊敬。四十多岁的哥伦布被加封为贵族，同时也被封为他新发现的岛屿的副王和总督。

哥伦布在他生命的第五个十年里，又两次去了新大陆。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没有到达印度，而是发现了一个新的大洲。1503年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加·韦斯普奇沿着南美洲海岸线行驶时，才想到这可能是一个新大陆。德国地理学家、数学家马丁·瓦尔德泽米勒根据阿美利加的名字在一张地图上称这个新大陆为“阿美利加”，即美洲。当哥伦布第四次即最后一次航行去新大陆时，他已经是进入五十岁年龄段的人了；这是1502到1504年之间。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坚信他已经按原计划到达了印度。

四十多岁的哥伦布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巨大的失望。哥伦布于1493年9月25日到1496年6月11日进行了第二次航行，他带了15艘船和大约1500个船员，去了小安德列斯群岛、牙买加和海地。他发现第一次航行时留下的39名船员因强盗行径全部被当地人杀害。之后不久，

即 1498 年 5 月 30 日到 1500 年 11 月 25 日他指挥着 8 只船,又进行了第三次航行,到达了南美洲的北海岸线(特立尼亚,奥利诺科河入海口,玛丽亚加朗特岛,海地)。在海地,他及两个随行的弟弟和当地总督波巴迪拉之间出现了不愉快,原因不明,但肯定是因为已发现并收集起来的黄金而发生了争吵。哥伦布和他的弟弟被波巴迪拉关进监狱,用链条捆住。四十八岁的哥伦布在信中写道:

“我郑重声明,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被他关押。波巴迪拉费尽心机,在我不在场并没有称重量的情况下,没收了我的黄金。他声称,会把黄金归还到它原本所属的那个人的手里。如果别人告诉我的情况属实的话,他把一大部分留给了自己。我把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收集到的有的像鹅蛋或鸡蛋那么大的金块存放在一边,是想把它们献给陛下,使陛下高兴。看到这些金块,他们就会清楚我所做的事情的价值。然而就是这些黄金,在他自己发了横财之后——他很急着发这笔财——又都被他狠毒地拿走了。这

样,陛下就会觉得这个岛没有太多的价值。我现在对金子的兴趣大于对珍珠的兴趣,因为珍珠很少,我不能为陛下带回珍珠。如果失去这些金子,我还得付400万元的什一税和各种捐税。如果他们要求追查这件事,陛下请相信我所说的都是真实情况,并且我希望在算账的时候允许我在场。波巴迪拉不停地强调,这么一大笔数目的黄金应该是他的功劳,而事实上这是我收集来的财富。”

在一封不是寄给陛下本人、而是寄给宫中的一个人的信中他继续写道:“通向黄金和珍珠的路已被发现。可以相信,宝石、香料和不计其数的其它东西也将会发现。”哥伦布似乎相信,上帝亲自答应给他指向通往黄金之路。“当那些不信神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亵渎了圣诞节时,也正是我想放弃一切、尽可能地保住性命的时候,我奇迹般地得到了主的启示:‘拿出勇气,不要气馁,不要害怕,我会帮助你。七年的黄金时代还没有过去。我会像在别的事情上那样帮助你。’在同一天我获知,离我这里24里(西班牙

里程单位,合 5,572.7 米。)远的地方有不计其数的金矿,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矿区。几个西班牙人一天就得到了价值 120 个卡斯特亚诺 (古西班牙货币名称)的物品……”

带着铁链的哥伦布后来被遣送回西班牙,这是哥伦布自己的意愿;遣送他回西班牙的船长在船刚离开海地时,就让人为这位海军上将打开枷锁。哥伦布却不愿意,他认为自己是以国王的名义被戴上铁链的,他必须一直带着它直到以国王的名义被拿掉。回到西班牙,他又戴了六个星期的铁链,直到最后从皇宫里传来释放他的命令并邀请他去皇宫。1500 年 12 月 17 日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接见了哥伦布和他的弟弟。

国王夫妇对他们是宽容和仁慈的,他们承认了他的巨大功劳,再次批准他拥有自己的收入所得和一切权力,只是附加了一个决定性的限制条件:哥伦布已身居高位,不再任命他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总督。由此可见,他除了和波巴迪拉的阴谋作过斗争外,还有其他的对手,在与

他们的斗争中显然他没有成功，哥伦布没有实现当总督的目标。可以想象，与那些想在新大陆发财的冒险家们共事是多么不容易。

哥伦布对此另有看法。他没有放弃曾经许诺过给他的职位和海军上将的头衔。如他一贯的行为，年逾五十的他要么获得应有的一切，要么什么都不要。在他进行第四次航行时（从1502年5月11日到1504年11月7日），他就已经跨入五十岁的年龄段了。这次航行是收获最少也是最不愉快的一次；那次他经历了人性的缺陷：仇恨、嫉妒、卑鄙。回到家后，国王赐给他和他的后代加那利群岛的伯爵封地，而没有像事先许诺的那样授予他海军上将和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总督职位。然而哥伦布还在继续坚持要求他的后代和继承人能世袭这些头衔。在哥伦布死后（1506年5月20日在巴利亚多利德去世，后来传说他在穷困中死去），他儿子迪戈被封为海军上将，三年后成为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总督。



**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

“虽然，我们不能像希望的那样克服这个障碍，但生活却领着我们绕过它，从它旁边滑过，然后又转回到遥远的过去。”



# 追忆逝水年华

——普鲁斯特

马塞尔·普鲁斯特：法国著名

小说家，《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

四十岁就穿越世界的哥伦布和法国文学家马塞尔·普鲁斯特之间的差别是无法想象的。哥伦布不断地去探求那片未知的世界，通过航行发现新大陆。四十岁的他将当时已知的世界差不多“扩大”了三分之一，而年近四十岁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却在走着一条与其截然相反的路。普鲁斯特，这位追忆逝水年华的诗人，渐渐地从这个世界隐退了。他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禁锢在他生活的那所房子里，最后则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房间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那里。他的隐退并不是为了主动地等待死亡，而似乎是为了以另外一种更有活力的方式去生活，那就是重新体验自己的过去，找回“逝水年华”，留住并且永远牢牢地握住它。他隐

退的决定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过于敏感的呼吸器官和日益加重的病情折磨着他，他不得不完全拒绝正常的社会生活。

马塞尔·普鲁斯特于 1871 年 7 月 10 日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名医家庭。孩提时父母特别地溺爱他，后来他逐渐发展成了这个家庭里的小暴君。什么事情一旦不合他的意，他马上就大发脾气。冲着别人大吼大叫，完全失去控制，或者打烂东西，比如说他自己的玩具。对于这些毁坏的东西他事后会很懊恼并且会暗地里责怪他的父母，因为是由于他们没有立刻同意他的一些要求才导致了他的愤怒。

父母对这个儿子却总是呵护有加，特别是母亲。普鲁斯特和父亲的关系不是很好：“我并不试图让他满意——我对此很清楚，我曾是他生活的阴影——但我还总是想要向他证明我的爱。尽管如此，我有时还是要反抗他那太过坚决和自信的看法。”

尽管在他身上不断表现出对自我的狂热，但他自己缺少的正是坚决和自信。这个少年是

如此的敏感，以致于他会由于一句生硬的话而整夜流泪。他不隐瞒他的反抗，就连批评也不隐瞒。他会因为一些他觉得是侮辱的批评而要求进行决斗。普鲁斯特学习的是法律并且一度在一个律师所工作，后来他开始了写作。

不久，他就被迫去费心保护他那过于敏感的身体，避免身体受到不断加重的病情的影响，特别是哮喘和劳累。劳累有时逼得他只能在床上度过一整天。

“我过着美妙的生活。我根本不再出门；如果我要起床的话，我会在晚上 11 点左右才离开床；……总是受到不可预知的疾病发作的威胁，我再也不敢有什么约会。真是一种美好的生活。”

不久之后，他在另一封信中自问：“我应该继续这样一种生活直到我生命结束吗？……一切都被剥夺了，一种与日光、与空气、与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娱乐，总而言之一句话，与整个生命隔绝的生活？……”

与一切的工作隔绝——这当然是不符合实

际情况的。因为尽管有病在身,他还是在工作,在几乎不透气的与世隔绝的环境下工作。他房间的窗子一年四季都关着,这是为了防止噪音侵扰,墙也用软木密封了起来。尽管越来越虚弱,他的工作量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他吃的却越来越少。将近四十岁的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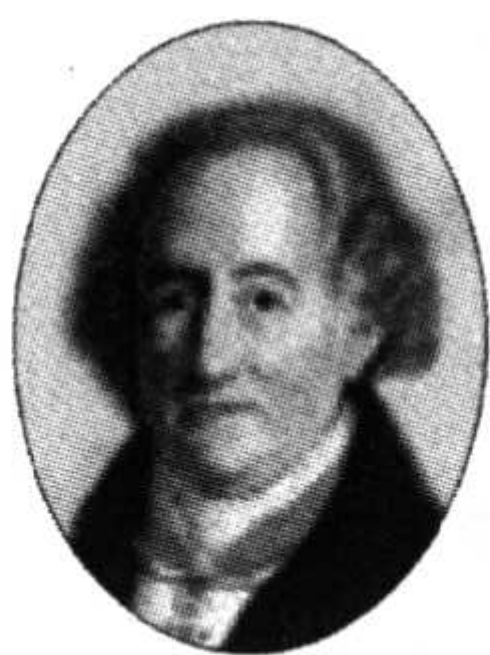
“我现在不再像先前那样,每 24 小时吃一次东西,而是变得没有规律,经常是每 48 小时才吃一次,并且每次只吃我以前饭量的一半。”

当他还没有生活在如此的孤独中时,他似乎早就他的命运有所预感,于是他有意识地去享受许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十分自然的东西。比如:海水的气味,风的声音,黄油在锅里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倾盆的大雨,桔树的花香。所以,当这些东西对于这个不惑之年的人来说仿佛将永远失去的时候,他尝试着回忆那段时光,那段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幸福的时光。在孤独和寂寞里他成功地做到了这点。

当他回忆起这些早已逝去的时光时,他同时也不断地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他确信:“我

们每天都在死亡。”他让房间弥漫着芳香,这种芳香的气息可以使他的呼吸变得轻松一些。普鲁斯特经常把死亡这一基本概念诠释出新的意义。比如说:“人们认为能够根据他的愿望和意志来改变他周围的事物。人们相信这一点,因为,除此之外找不出更好的解决方法。人们不会想到最常出现的而且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东西:我们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去改变事物,但是我们的意愿却会渐渐经历一种转变。我们原本希望改变让我们无法忍受的状况,后来变得无关紧要了。虽然,我们不能像希望的那样克服这个障碍,但生活却领着我们绕过它,从它旁边滑过,然后又转回到遥远的过去。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去发觉,对我们而言只有这么少的东西还是可以感觉到的。”

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他五十一岁的时候去世了。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追忆逝水年华》:共3卷约4200页。



约翰·沃尔夫冈·冯·

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人们往往不知道，当  
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拥有的东西。”

# 幸福的父亲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德国作家，公认的世界文学巨人之一。集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成就于一身。代表作《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列那狐》、《诗与真》、《亲和力》等。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于 1749 年 8 月 28 日出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对于不惑之年的他来说生活带给了他一些全新的、以前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他做父亲了。歌德早在三十岁的时候就成名了，并且拥有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位，收入颇丰。那时的他认识到，在当时的职位上不能够再有所作为了，所以他试图退出。他悄悄地离开了魏玛和那里的朋友，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意大利旅行。魏玛政府的工作使他劳累过度，他感觉到，那些日常琐事就要让

他窒息。当他后来、快四十岁再回到魏玛的时候，他几乎辞掉了所有的职务，只保留了顾问委员和类似于文化部长的职务，但他的部长级高薪却一分不少。现在，歌德终于又能有时间从事他的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工作了。像以前那样，他再次住进了费劳恩普兰的那栋大房子里。尽管他从前只是租用了这所房子，但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他的财产，这是公爵的礼物。现在他想要把它改建一下。

这时，他正巧结识了克里斯蒂娜·武尔皮乌斯。他爱上了她，尽管她根本算不上什么美人儿。但是，这一点正是他所需要的：一个单纯的大自然的产物。1789年圣诞节的第一天，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那时歌德四十岁，克里斯蒂娜二十三岁。整个魏玛都在谈论或者背后议论这件事情，这其中有足够的谈资：一个是伟大的诗人，一个是却是矮小的、敦实的、没有教养的、没有社交能力的、曾经在生产塑料花的工厂里做过工的女孩。他却偏偏选上了她做女朋友，做“情人”。就是这位曾多年来用一种崇高甚至令



人敬畏的方式、以纯精神式友情对那位受人尊敬的(但是已婚的)冯·施泰因夫人心怀感激的诗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尽管他决心不让自己受到外界的干扰,但是外面的风言风语还是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小宝贝难产已经五天了,有可能会死”,卡罗利妮·冯·博伊尔维茨——席勒的嫂子,早在12月初给席勒的一封信中谈到四十岁的歌德时她写道:“他病了,或者说,他自称因为他的小宝贝而病了,而且他整天不出门。”

歌德儿子的洗礼于1789年12月27日早晨八点钟在圣雅各布宫廷教堂内举行,孩子是以奥古斯特·瓦尔特的名字受洗的——奥古斯特是克里斯蒂娜兄弟的名。洗礼仪式上,只有教母——克里斯蒂娜的姨妈尤利亚妮一人在场。歌德曾请求他的朋友魏玛公爵,做他儿子的教父。公爵也答应了,但是洗礼时却没有到场,而且也没有派代表来参加。

不久之后,歌德受公爵的委托到威尼斯去出差。刚刚出发不久,他就挂念起他的儿子和孩

子的母亲。所以，他在旅途的第一站耶拿就给魏玛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写信：“人们最后总是会变得善良、谨慎。我走后，如果我的爱人和孩子，碰到什么事而他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就孤立无援了。所以，我对他们说过，在这样一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请求你的帮助。请原谅！”

到威尼斯之后，他给公爵写信说，他这次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些“意大利人”。“此时，我对还留家里的爱人和在襁褓中的小宝宝心怀眷恋，如同我其他的一切一样，我把他们两个托付给您了。”

不惑之年的歌德刚做父亲不久，对于家人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赫尔德在一封信里夹带了一封他“情人”的信，歌德是这样记录的：“它给我带来了这样的好消息，孩子又好起来了。曾有十四天他的情况很糟糕。这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对此我还没有习惯。”

在歌德做父亲的最初几年间他常常不在家。克里斯蒂娜和儿子搬进了费劳恩普兰的那

栋房子里。歌德让人对这栋房子进行了较大的改建。前面的房间作客厅,用来做接待,后面的用作起居室。整个改建是由画家和艺术批评家海因利希·迈尔来主持的,歌德在意大利与他相识后,便把他接到了魏玛自己的家中,供应其膳食住处。1792年,歌德随同公爵远征正在进行革命的法国时——德国的封建领主希望通过这场战争来恢复德国原有的王权——迈尔也一直住在他家里。

去法国的途中,四十三岁的歌德顺道去故乡法兰克福看望了他的母亲。这是他13年来第一次回乡看望母亲!他首次向她讲述了他所爱的人——像他母亲后来说的,他的“床上宝贝”——以及他们快三岁的儿子。不过不能肯定的是,他是否在这一次就已经向母亲提到了他的“爱人”和孩子,还是后来才告诉母亲的。因为来自法兰克福的母亲问候只是写给他一个人的。歌德给克里斯蒂娜的第一封信在到达哥达的时候就已经寄出了,他有些忧伤地写道:“远离自己所爱的人,人就无法做任何事情,时间流

逝却找不到什么可以替代。”他诉说着夜里臭虫是如何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并且就此结束了这封短信：“在这里，我除了美好的问候和我非常爱你的保证之外没什么可以寄给你的了……再会，爱我，保重，还有吻一下小宝宝……”

不惑之年的歌德常常想家。每隔几天，他就给在魏玛操持家务、照顾小“奥古斯特”的克里斯蒂娜写信。1792年8月25日他从特里尔写信给他最爱的人：“你不知道也无法想象特里尔这个小城在什么地方，最糟糕的是它离魏玛很远，也就是说，我离你很遥远。我很好……我们大约还有一天军队的行程，我在这儿，在一个旧的牧师的住所，周围环境还算不错。明天我从这里出发，后天就可以到达营地。一旦有可能的话我就会再给你写信，你完全不用为我担心。我希望很快就踏上归途，我惟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到你和孩子。人们往往不知道，当他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拥有的东西。我非常想念你，从心底里爱你……再见，亲爱的天使，我的全部都是你的。G。”

歌德下一封寄回家的信是 1792 年 8 月 28 日在隆维的营地写的。那天是他四十三岁的生日，但是他没有在信中提到这一点：“昨天我到达了营地，到了公爵身边，我觉得他状态很好并且精神振作。在他的帐篷里，在劈柴、点火发出的噪声中我给你写这封信。外面的雨几乎一直下个不停。身上的衣服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总是湿湿的，我在公爵的卧铺马车里找到了一个可以过夜的位置，对此我已经很满意了。所有的食品都短缺而且很贵。”

整整一星期后，他到了凡尔登：“我们还在凡尔登，但是马上就会继续前进。我身体很好，没有时间去忧郁。如果你在我身边的话该多好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期待的了。我总是想念你和孩子，想我在家里、在花园里看着你。我想，如果我回来的话，一切会是多么美好啊。你只需要继续爱我，不要浪费你那多情的眼神，你只要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准备好做我亲爱的小厨师就行了。没有什么能比相爱和在一起更好的了。再见，永远是我的。我真的很爱你。”

两天后,仍然驻扎在凡尔登的歌德承认,他在这么遥远的地方有时候也会嫉妒:“你现在要是在我身边该多好啊!这里到处都是又大又宽的床,你不会像有时候在家那样抱怨的。哦!我的宝贝!没有什么比我们在一起更好的了。我们要常对自己说,我们团聚,在一起多好。你不能想象,我们现在离香槟酒产地是多么近,可这连一杯好的葡萄酒都找不到。费劳恩普兰情况应该比这里好得多,愿你做一个家里的好宝贝,打理好厨房和地下室,为我布置好一个美丽的家,照顾好我的儿子,还有,永远爱我,永远爱我!因为,有时我会很嫉妒并在设想:你有可能更喜欢另外一个人,因为我有时候觉得许多男人都比我帅,比我可爱。但你不要看他们,你得认为我是最好的,因为我非常爱你,除了你我不会喜欢其他任何人。我经常梦见你和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我们总是如此相爱。希望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在母亲那里订了两个床垫和羽毛枕头,还有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你只要把我们的小家布置得井井有条就可以了,

其它的事情应该已经办妥了。在巴黎什么东西都会有的……我今天买了一小篮甜酒和一小包糖果。家里总应该存些东西。永远爱我并且做一个忠诚的孩子。如果我没有拥有你的心,其它的事情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我所拥有的,我还想继续拥有它们。当然我也是你的,给孩子一个吻……还有,爱我。”

占领巴黎并且从那里捞到好处的计划失败了。同盟军停滞不前。10月10日歌德写信回家:

“你现在就可以知道,我们不再向巴黎进军了,相反我们在撤退。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也许已经回到德国了。战争并没有像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但是你的愿望却即将实现了,那就是我很快就会来到你的身旁。

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的身体却很棒,我什么也不缺而且根本谈不上忧郁。你会再次见到你健康开朗的男朋友。

你做得很好,你从不给我写有关我们儿子的病情或不适,每次都是在他病好了后才告诉

我。我希望很快可以再见到你们俩，紧紧拥抱你们，贴近我的心。

如果我给你写了什么让你感到悲伤的东西，请你原谅我。你的爱对我而言是如此珍贵，假使我失去它，我将会非常不幸，你必须原谅我的一丝嫉妒与担心……

我希望几天之后我就又回到你身边了，在这之前你还会收到一封信。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再次去喜剧院看戏，至少晚上也会有点消遣的东西了。

再见，给小宝宝一个吻，做家务的时候轻松愉快些。——我是在凡尔登给你写这封信的，壁炉火焰的温暖使我再次消除了疲劳……”

圣诞节前夕歌德回到了家里。如果人们看了他从法国寄出的信，而不只是这里摘录的一些片断的话，那么有一句话是经常被人们引用的句子：“从今天起，从现在起，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你们可以说，你们见证了这一切。”这句话据说是他 1792 年 9 月 20 日在瓦尔米连续炮击的那个晚上说的，但是这句话由于没有证





明人,所以不是十分可信。不惑之年的他在家里给朋友写了一封信:“我很好,而且很高兴,我的最爱很能干,做家务很认真;我儿子健康活泼地成长,……我们紧紧握住我们彼此间的爱神。”从中我们看不出,战争落下帷幕后,歌德对自己能够亲历其境的渴望和自豪。

两个月之后,四十多岁的歌德(他以前负责过一支乡下的小军队并且还将其裁减得更小了)便不得不陪同他的公爵再一次远征。这次他带着比第一次更大的担忧离开,因为不久之前,他的儿子得了水痘。幸运的是病情不是很严重。后来,克里斯蒂娜在第一封信里已经能够给这位父亲捎上一句三岁儿子的话,不过是她握着儿子的手写的:“亲爱的爸爸,我很快就好了。给我寄点儿东西吧。”

逐渐病愈的奥古斯特想要父亲带点儿礼物回来。这回,法兰克福的祖母也捎来了礼物,因为歌德途中又去看望了她。此外,奥古斯特对战争玩具特别感兴趣,他要一把军刀和一只步枪。这一点他那热爱和平的父亲一点儿都不反对。

歌德的母亲从那个时候开始每年圣诞节，同时也是她孙子的生日那天都会寄来一箱“用滑膛枪装备的步兵”和“特种部队士兵”的玩具。歌德自己在他儿子四周岁生日的时候，也就是1793年的圣诞节甚至想要送给他一个当时很流行的、但很可怕的礼物：一个小断头台。这是按照那一年刚刚被引进到法国、在法国大革命中已经非常成功使用过的斩首机的样子制作的。因为他在魏玛买不到这个玩具，于是，他请母亲帮忙在法兰克福购买这件礼物。但是，歌德的母亲非常吃惊，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

“亲爱的儿子！”她在给她四十三岁的“娇生惯养的儿子”的回信中写道：“所有我能帮得上的忙，我都会非常乐意去做。但是购买一个这样可怕的杀人机器，这我无论如何不会做的。如果我是当权者，我会给制造它的人脖子上套上铁镣，把这杀人的机器公开焚毁。让年轻人玩这些残忍的东西？把杀戮和流血当作消遣交到他们手上？不，这绝对不可以。”礼物也就此作罢了。

不过，奥古斯特也很喜欢和动物玩耍。有一

次，克里斯蒂娜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也得跟你说一些关于小宝贝的事了。他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漂亮多了；我觉得他和你长的非常像。他很喜欢动物，喜欢花园里的那只生机勃勃的苍鹰和一只松鼠。但是，这只松鼠昨天夜里挣脱链子逃跑了。为这他哭了整整一个早上。”

歌德回信道：“代我向他问好，并替他养好那各种各样的动物，因为他很喜欢它们。”不惑之年的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儿子是一个快乐幸福的孩子。我希望他能用他那双美丽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上许多美好和善良的东西。”

奥古斯特那双美丽的眼睛正如他母亲的眼睛一样乌黑明亮；他的头发是淡淡的金黄色。“奥古斯特是一个非常标致的小男孩”，后来一个来自耶拿的他小时候的伙伴是这样回忆他的，“歌德对他的依恋是无穷无尽的”。歌德在耶拿给自己另找了一处住地，那时的他已经四十三岁了。因为，在魏玛的费劳恩普兰的家里，他无法安静地工作。最初几年过于孤独的克里斯

蒂娜把她的姨妈接到房子里来住，后来又把她妹妹，有时甚至还把她的哥哥也接过来。所有的这些亲戚——当时迈尔也还住在这幢房子里——让不惑之年的歌德心烦得很。每当这时，他就会搬到耶拿住上几天或几个星期。或者也会去伊尔默瑙的采矿场，歌德还在负责那里的监管。偶尔他也会带上儿子一起去。在他四十六岁生日那次就是这样的，那个生日他没有在家里庆祝。他从伊尔默瑙写了一封信给克里斯蒂娜：“我和小宝贝都很好。这里的天气不错，有几天特别好；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小家伙很乖，对他看到的许多事物和工作都很高兴。他可以把一切都清楚地记住并能提出十分理智的问题。他和大家相处得都很好。

我让人给他做了一件矿山制服，因为明天矿工们要举行一个游行，他也要一起去。这让他特别兴奋。但是，他却不愿意一起去教堂。

别人送给他一个小茶杯，他要把它带给你。他吃的也安稳。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钟醒来，晚上也很早就上床了。”

奥古斯特是歌德惟一的孩子。虽然克里斯蒂娜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但都在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其中一个死胎。所以，奥古斯特非常得宠。但是，他还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和她母亲（歌德 1806 年才和她结婚）一样、与他身份真正相当的名分。歌德深知这点，这是无法被忽视的。但他却顺其自然，任其发展——就像他生活中的某些事一样。

歌德原本也想让他的儿子接受应该有的正规的教育。虽然请了一个家庭教师，但是奥古斯特去老师那里的次数远比他应该去的次数少。歌德本人一直都不太赞成系统的教育，他认为，系统教育对一个人的生活和心理的干涉以及个性压迫的危险在他看来是非常巨大的。在奥古斯特差不多十岁的时候，歌德给他的朋友克内贝尔写了一封信：

“我的奥古斯特正在成长，他对某些事物特别有兴趣，比如对写作、语言以及所有需要去观察的事物，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好。我惟一不放心的就是如何培养他内在的具有天分的東西以及

如何让他把所学的东西加深并掌握它。我们通常的教育总是无缘无故地逼迫孩子们学习很多东西，这种教育导致了很多我们在成年人身上可以觉察到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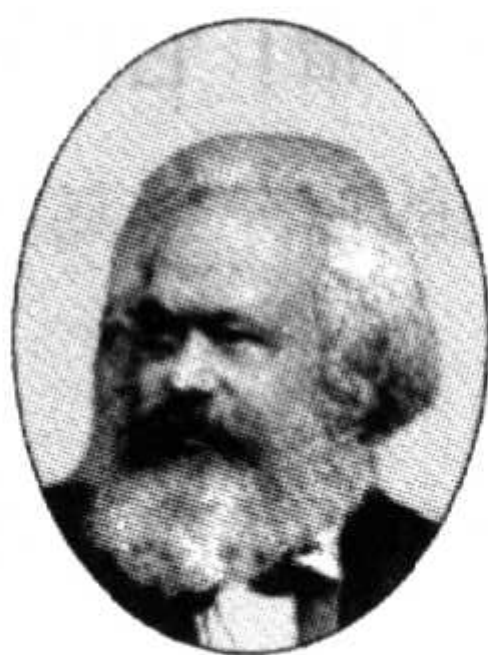
歌德认为，奥古斯特通过他这位父亲，以及通过他周围的环境能够并且绝对可以看到和学到足够多的东西。也许是由于奥古斯特很喜欢动物的缘故，有一天，歌德在阿波尔达附近的奥伯洛斯拉买了一处庄园。虽然歌德自己不管理那个小庄园，但是偶尔也过去看一下经营的情况，也许还可以在那儿放松一下。在那里马匹和车辆一应俱全。但是，歌德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耶拿度过的。奥古斯特必须经常往他那儿写信汇报情况。例如八岁的奥古斯特写道：

“昨天对我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因为我们宰杀了两头小猪。当它们被割断脖颈的时候我也在场；其中一只叫得比另一只响。然后，我还看到香肠是怎么做出来的。两头猪加起来有130来斤重。我得到了猪的尿泡；一个人帮我把它们吹得好大好大。”

九岁的奥古斯特写道：“我的两只小鸽子不在了，就是我在一封信里跟您提到过的那两只。星期四清晨，我发现它们死了，好可惜！它们虽然死了，但还是有用的，它们给我的密尔维乌斯（他的鹰）提供了一顿美味的早餐。”

歌德在他生命中的第五个十年中不仅扮演了好父亲，同时也在努力地工作着，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努力。他结束了《罗马哀歌》的创作，完成了《威尼斯警句》，继续致力于《浮士德》第一部的创作，写有喜剧《平民将军》、小说《德国难民的谈话》、《列那狐》、《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叙事长诗《赫尔曼和窦绿苔》，还写有《进军法兰西》、《围攻美因茨》以及《1797年瑞士之旅》。除此之外他还在撰写他的《色彩学》，起草了《植物的蜕变》，《光学论文集》，草拟了《比较解剖学导论草稿》，除了这些他还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并且为他《倾听》杂志的出版做准备。但是这些还远远不是他创作的或者开始创作的全部内容。自1791年以来他一直出任魏玛宫廷剧场的监督。





**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要是我知道该从哪件事开始做就好了！”

## 如何和钱打交道

——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

马克思 1818 年 5 月 5 日出生在特里尔。1847/48 年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848 年大革命之后不久，三十岁的马克思就作为无国籍者被驱逐出了德国。当马克思四十岁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在伦敦过了 10 年的流亡生活。他为不同的报纸写文章，当然首先是致力于《资本论》的创作，但是他从来也没能挣到足够的钱去养活自己和他的家庭。他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主要是由于他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经济上的慷慨资助。那时恩格斯也在英国并在那里继承了父亲的一座工厂。马克思差不多一辈子都在写他的经济学

理论著作,自己却根本不知道如何和钱打交道。

马克思早在柏林做学生的时候就不会管理自己的钱,尽管他家里十分慷慨地资助他学习。他的父亲很吃惊,责备儿子道:“最富有的人一年连 500 塔勒都没有花完,而我们的儿子一年内竟然花了将近 700 塔勒,他不理会所有的议论,也不在乎所有的风俗习惯,就好像我们是有钱人一样。”的确,他在做学生时的花费是相当大的,差不多和一个柏林市议员的年收入一样多,而其他的学生却知道“用 180 到 200 塔勒非常棒地去生活”。钱总是在他的手里化为乌有,这种情况在他的一生中都没有改变。

在流亡期间,他要养活一个六口之家:妻子、三个孩子和一个女管家,这自然不是那么简单。他经常连买稿纸的钱都没有。有时候他甚至无法出门,因为就连他的衣服都送到了当铺里了。恩格斯总是一再地接济他。但是,马克思一旦手头宽裕一些——有一次他妻子继承了一笔 5000 马克的遗产——就立刻提高他的生活水平。他经济拮据的根本问题也就在于此,所以,

他从未摆脱过经济上的窘境。他不是一个乱花钱的人,也不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士,他和他的妻子只是想要过得殷实一些,或者至少表面上看起来,他们生活得很殷实。

在他将近四十岁的时候,他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的处境比五年前更加糟糕。我想我肯定是吞下了什么污秽之物的精髓。最糟糕的是,目前这种危机并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该如何从中摆脱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他所有能够抵押的东西都再次送进了当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脑子很混乱,根本不能写作。情况糟透了”。

1861年5月,四十三岁的马克思从一个荷兰的叔叔那里继承了3000马克。但是一个月后,他就又不得不向恩格斯紧急求助,请求借给他40马克,用来缴纳税款。第二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要是我知道该从哪件事开始做就好了!我的朋友,所有的理论都是那么的空虚无望,只有生意才能给人带来希望。可惜这点我明

白的太晚了。”他在给恩格斯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我妻子每天都对我说，她真希望她和孩子们不再活在这个世上。我的确不能责怪她，因为在我们这种状况下，她所经受的耻辱、痛苦和惊吓的确是难以形容的……可怜的孩子更让我感到内疚，他们的朋友们在娱乐消遣，而他们却担心别人来访看见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864年的夏天，当马克思四十六岁的时候，他继承了3万马克的遗产。在那个年代里，这可以算是一大笔钱了。但是，马克思没有用这笔钱来偿还债务，也没有用这笔钱将家里的财政状况引入正轨，而是立刻搬进了一栋更大的房子。差不多一年之后这些钱就花完了，而他的经济状况又和从前没有两样了。他向总是很乐于助人的恩格斯解释道：“如果你考虑一下，你就不会对此感到惊讶：首先，这段时间以来我没能挣到一个法辛（ $\frac{1}{4}$ 旧便士，英国面值最小的钱币。）；其二，光是还债和房子里的设施就花了我500英镑。对每一笔开销我都做了记录，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这些钱怎么就这样消失

了?……当然,我现在的住所对我的状况来说真是太贵了点,我们今年生活得也比往年更好些。撇开孩子们所受的苦以及在近期内得到的补偿不谈,这样的生活是让孩子建立对他们今后有保障的人际关系的惟一方法。”

在这封信里,马克思还向他的朋友讲述了他《资本论》撰写的进展情况:“关于《资本论》的进展,我得跟你说实话,还有三章要写。那样理论部分就写完了,然后就只剩第四册的历史和文学的部分要写了,这部分相对而言是最简单的,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面三册中谈过了。这最后的部分都是一些历史事件的重复。但是,在我把它全部完成之前,我不会寄出其中的任何一部分。不管它有哪些缺陷,我作品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在它全部完成之前我是不会把它交付印刷的……”

马克思谈及《资本论》的工作让恩格斯感到非常高兴,他立刻回信道:“我很高兴你的书进展迅速。从你上一封信的一些表达中,我真的开始怀疑你是不是又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



点，而这个转折点可能会把一切无期限地推迟。”

恩格斯常常担心他的朋友在《资本论》这本书上不能真正地有所进展，他的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马克思不仅要经受着无休止的缺钱的烦恼，而且还要经常忍受病痛，特别是肝病和身上不断出现的疼痛难忍的脓包。2月10日，他给恩格斯描述了他的近况：

“亲爱的弗里德，这次是关于我的皮肤。家里人还不知道情况有多严重。如果这玩意儿像这样再反复三四次的话，那我就是死神的人了。病情恶化得很厉害，我非常虚弱，不是脑子，而是腰和腿。医生说的的确是对的，过度的夜间工作是导致病情复发的主要原因……中断我的工作对我来说是最讨厌的事。不过，一月份以来，也就是从我的肝痛消失之后，工作进行得还非常顺利。当然，谈不上‘坐’着工作了，这让我感到很不方便。但是，即便是在白天短暂的间隔里，我也躺着继续工作。在原先的理论部分我不能有所进展了。对此，大脑显得太虚弱了……”



由于马克思总是不得不忍受恼人的皮肤病的折磨,于是恩格斯便找了个医生做了咨询,然后转告马克思医生对此的意见:“他很肯定地认为,你应该尝试一下砷药。他在一个类似的病例和一个非常严重的脓包疹病人身上使用过这种药,大约三个月后病人就完全康复了。他现在给三个女病人也用了这种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她们都长胖了。他给的剂量,我想是每天三次,每次三滴(我记得不是那么太清楚了),不过大体上是每天病人需用大约 1 格令(格令,最小重量单位,相当于 0.0648 克。)的砷。对于砷在治疗所有皮肤病上的特殊作用这里也都有介绍……在用砷治疗的时候根本不用特别去注意饮食什么的,只要好好地生活。”

年近四十五岁的恩格斯还劝告他说:“你得真正地去做一些理智的事情了,从这皮肤病的阴影中走出来,即使因此会耽误你三个月的写书时间。这件事真的是很严峻的。如果你的大脑如你自己所说的那样已经没有能力从事理论部分的工作了,那么就让它从高深的理论中摆脱

出来休息一下。暂时停止晚间的工作,让你的生活节奏变得有规律些。”

《资本论》的出版最终不止耽搁了三个月。1867年4月,年近四十九岁的马克思带着终于完成的第一卷手稿穿过海峡的风暴到汉堡去拜访了出版商奥托·迈斯纳,同年奥托·迈斯纳出版了这本书:《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4月27日恩格斯写了一封令人高兴并且感到慰藉的信:

“亲爱的卡尔,……我总是觉得,长久以来这本该死的书给了你很大的压力,它是造成你凡事不顺的根源和关键。如果你一天不把它写出来,那你一天就无法从中走出来。这延续了很长时间的工.作给你的身体、精神和经济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我很能够理解你,在摆脱了心灵的重负之后,你感觉又和常人一样了,特别是当你又踏进周围的世界,觉得这个世界也不像从前那样忧郁了……这彻底的转变令人快乐,首先是很高兴,其次是你,还有你的妻子,再次就是,该是一切都会变好的时候了。……”

卡尔·马克思在四十岁到五十岁这十年间，经历了很多痛苦和很多烦恼，特别是他的疾病和两个孩子的夭折，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少阴影。但他的这10年还是以这样令人满意的成功结束了。对自己的成功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在德国过完四十九岁生日的两天后，他给朋友恩格斯回信道：“亲爱的弗里德，……我希望并且坚信，一年之后我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我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经济状况并且可以再次自力更生了。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根本就无法完成这部作品。因为我的缘故，使你在商业上浪费了你出色的才能，而且你还不得不和我共同经历一些困难和痛苦，……这些对我来说总像是压在良心上的一个重负。”

但是，遭受失望的卡尔·马克思把希望定得太高了，实在是太高了。一年之后他还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并且似乎永远也不会成功。《资本论》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他的很多朋友对此都表示了失望之情，这使得马克思感到万分沮丧。恩格斯写了一系列的评论文章，并且投给了

许多家不同的报纸,其中一些评论是否定的,希望由此能够引发一场争论。但是《资本论》(第二卷未完成)的影响一直到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那时的卡尔·马克思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就将近六十五岁了。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会  
如何面对你，放心吧，朋友  
的目光祝福着你。”

## 对私生子的恼怒

——黑格尔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提出系统的辩证法理论，其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主要著作有《哲学全书》、《逻辑学》、《精神现象学》等。

哲学家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于 1770 年 8 月 27 日出生在斯图加特。近四十岁的他也有经济上的烦恼。他曾做过较长时间的家庭教师，并且尝试过做一名报社编辑（他根本就不喜欢这份工作）。在他三十八岁的时候，他被“以巴伐利亚州陛下的名义”任命为纽伦堡埃吉丁高级中学的校长同时被任命为“哲学预备科学的教授”。这听起来很好听，但实际上薪水很低，而且常常被拖欠，以至于有时候黑格尔几乎不能维持每日的生计。尽管如此，他抱着不久就会在某所大

学扬名的希望于三年之后结了婚。当时,他那部体现了他理论体系基础的作品《精神现象学》已经圆满完成了。

新娘的父母给他们的女婿提出的条件就是尽可能快地谋取一个大学教授职位。新娘是纽伦堡市政官员约布斯特·威廉·卡尔·弗赖赫尔·图赫尔的女儿,结婚时她刚满二十岁。黑格尔深深地爱上了她,用富于幻想的狂热的诗句来歌颂她。一个在机关教育部门工作的朋友认为新娘父母提出来的条件是可以实现的。四十一岁的黑格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我听说,如果您还从事这项工作的话,那情况有可能比先前好。由于那件事情还没确定下来,我的信可能是多余的。但是,我还有一个希望,这关系到一个非常非常可爱优秀的姑娘。我幸福的一部分就是和这希望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我需要确信能够在大学里教书。从前天开始,我可以确定,我已经深深地爱上她了。她叫玛丽·图赫尔。我知道,您也会衷心地祝愿我幸福。我也对她说了,我会首先告诉您和您的夫

人。”

他的朋友给他回信说，黑格尔可以把埃尔兰根大学的聘任看作是十拿九稳的。尽管关于聘任的事后来不了了之，但当时新娘的父母读了这封原本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信后很满意。婚礼于1811年9月16日在纽伦堡举行。他的这段婚姻共有三个孩子：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但女孩在出生之后不久便夭折了。尽管婚姻的初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

结婚不久后，有一个女人来找黑格尔，她是他在耶拿时房东的妻子。黑格尔在耶拿取得了教授的资格并且曾在那里做过私人讲师。几年前，黑格尔曾和她发生过关系，他们有个儿子。在她丈夫死后，黑格尔好像在什么时候向这个女人许诺过将会和她结婚。反正这个女人后来是这么声称的。在黑格尔和玛丽·图赫尔结婚以后，她出现在纽伦堡并且坚持“以最卑鄙、最低微的方式”向黑格尔要一笔一次性补偿。黑格尔从来没有对自己是否是孩子的父亲这点提出过异议，他还对他的妻子讲了这个1807年初出生



的儿子。他叫路德维希，在黑格尔结婚的时候已经四岁了。

黑格尔和他的妻子收养了小路德维希，小男孩的母亲也同意这么做。开头几年一切看起来都很好。黑格尔把这个十岁的“小黑格尔”用四行诗写进了家谱：

当你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见到了你  
以极大的自信迎接这个世界；  
在未来的日子里她会如何面对你，  
放心吧，朋友的目光祝福着你。

但是不久以后，路德维希就不再让人放心了，因为他必须和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来分享他的地位，由此他感到被继母冷落了。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并且越来越难相处了。他觉得，大家对待他总是比对那两个小弟弟要少几分体贴和细心，他的这种感觉是否正确现在已经无法弄清楚了。但至少从黑格尔认真记录的家庭预算帐本上可以看得出来。在路德维希十二岁生日的时候只花了很少的几个钱，而同年最小的弟弟生日的花销与他的相比则高出一大截。当然，这

似乎不能完全成为他受到不同待遇的证明。尽管如此,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黑格尔让他上了很好的学校。

但是有一天,黑格尔决定让路德维希辍学,尽管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特别是在拉丁语和希腊语方面,有一段时间甚至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可能是有其它的困难,黑格尔把他送到一个商人那里去学徒,不在纽伦堡,而是在斯图加特。人们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路德维希后来声称,他其实是想学医的,但父母强迫他去学徒。他说,在他们面前他生活在持续不断的惶恐中。

在斯图加特学徒期间,路德维希贪污了一小笔钱,大概几个硬币。但是黑格尔对此非常气愤,以至于禁止他的儿子从此姓黑格尔。路德维希不得不从那个时候开始跟他母亲姓“菲舍尔”。路德维希再次感到这是侮辱性的耻辱。

四十多岁的黑格尔一直都没有和他言归于好,以后也没有。但是,黑格尔后来给路德维希,这个多少算是被他赶走了的儿子买了一个高级军官委任状去荷兰的殖民部门工作。二十六岁

的时候,路德维希·菲舍尔又名黑格尔在雅加达阵亡。在他去服兵役的时候,他的父亲没有给他写过一句告别的话。

黑格尔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四十三岁时他成为了督学)、大学老师(四十八岁时他作为费希特的后继者被柏林大学聘为教授),对很多人来说他是“整个民族的老师”。他认为,他那个时代的普鲁士王国创造世界史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黑格尔的态度是强硬的,特别是针对那些批评他的人。面对批评他从不畏避,曾经针对其中的一个人他还成功地得到了国家的帮助,那个人后来被吊销了教师资格。那时,黑格尔的荣誉和影响都达到了顶峰,成为了“教授之教授”,这时的他早就是五十岁的人了。但同样,他也无法让他的批评者永远沉默。比如说阿图尔·叔本华,他一生都对黑格尔很恼火并且在他的作品《充分理由律的四重根》中针对黑格尔的一成不变的哲学体系写下了如下的一段话:

“如果沮丧突然袭来,我总是会想到我们是在德国,而绝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充

满了枯燥无味、愚蠢无知的、瞎扯的、头脑被史无前例的空洞的文字游戏彻底搞混乱了的冒牌的哲学家,我这里指的是我们高贵的、被尊为灵魂伟大的和思想深刻的黑格尔。那些人不受惩罚地这样称呼他,他们相信这点,30年来一直都相信,直到今天!”



**罗伯特·科赫**

**Robert Koch**

**1843—1910**

从此,细菌学的发展一发而不可收拾,由此在医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 瘟疫的克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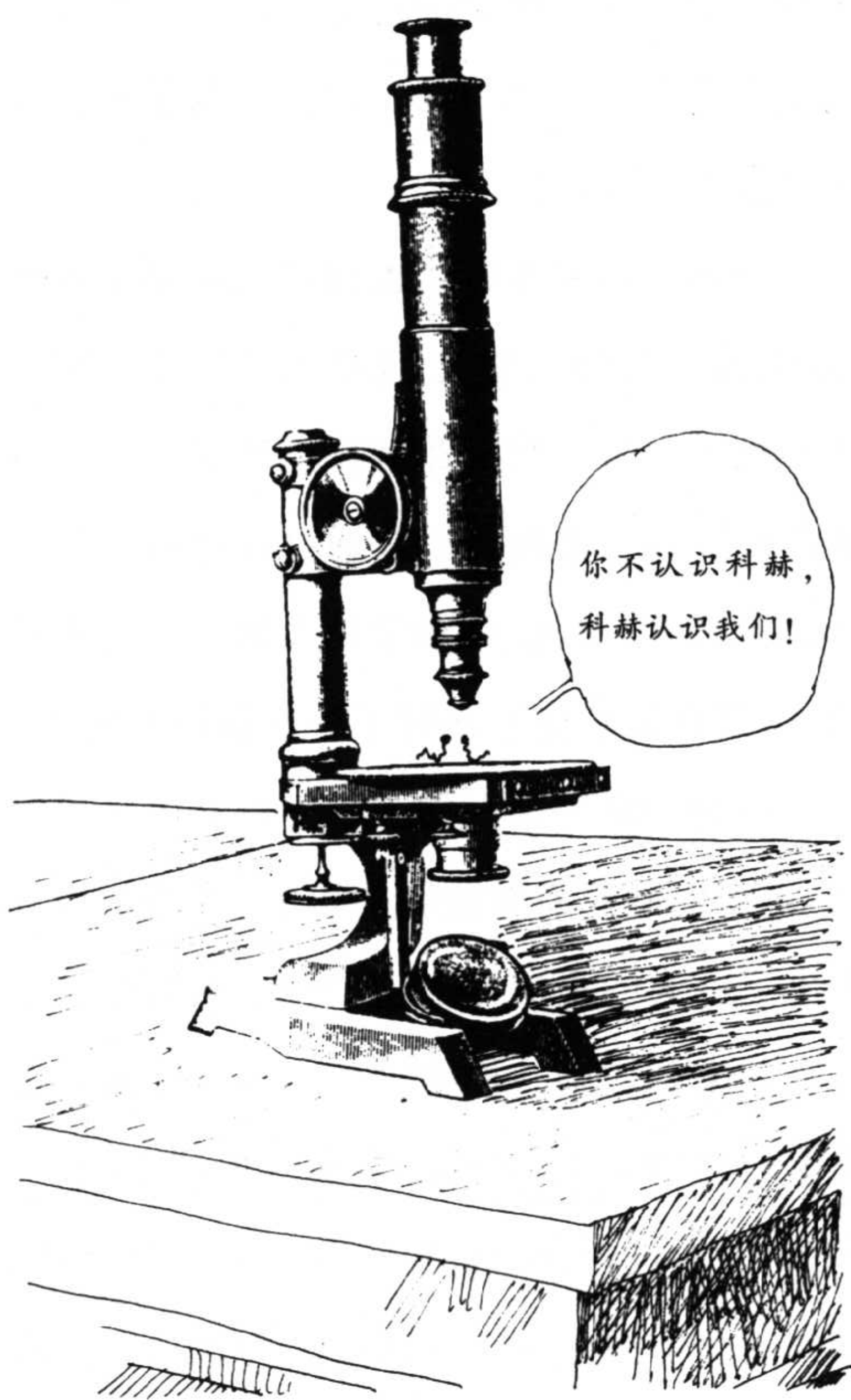
——罗伯特·科赫

罗伯特·科赫：德国细菌学家，  
发明细菌纯培养法和染色法，发现  
了炭疽菌的生活周期和结核杆菌，  
1905 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恰好在他四十岁生日的这一天，也就是 1883 年 12 月 11 日，罗伯特·科赫医生作为一个德国霍乱考察队队长到达了加尔各答。他公开宣称，此行的目的就是解开霍乱之谜，也就是说，识别霍乱病原体。罗伯特·科赫和他的同事是从埃及来到这里的。那年夏天，埃及爆发了霍乱。自从 1880 年以来，科赫在柏林的卫生局工作，1883 年 8 月初他们从柏林被派遣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在那里，科赫对许多霍乱尸体的解剖工作。他总是不断碰到肠壁上的像逗号形状的芽孢杆菌，他用这种芽孢杆菌感染了一些从柏林带来的实验动物，如老鼠、猴子、狗、母鸡，

但实验却依旧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无法证明科赫于 1866 年在汉堡霍乱死者身上发现的逗号形状的芽孢杆菌确实就是瘟疫的病原体。无论是在汉堡还是在埃及这个问题都没能得到解答,因为瘟疫突然之间就消退了。所以,罗伯特·科赫请求柏林允许他把实验室搬到印度,搬到加尔各答,因为那里有很多的霍乱病例。

罗伯特·科赫,1843 年 12 月 11 日出生于克劳斯塔尔,在沃尔施泰因作为一个乡村医生和卫生防疫站主任医生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1876 年他就开始基于彻底变革的考虑借助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方法探究炭疽热的病原体了。这是一种首先在牛、羊体内出现的、多数为致命的、同时也会传染给人类的传染病。那时人们根本不知道这种传染病能够通过微生物,即通过细菌或者芽孢杆菌或者由这些物质形成的毒素而产生。罗伯特·科赫通过在显微镜下仔细的观察和不懈的研究找到了这之间的联系。1882 年,三十八岁的他发现了令人十分恐惧的、当时的医生对此还完全无能为力的结核病的病原





体。当时有很多医生和科学家对科赫的发现、认识 and 理论持极其怀疑的态度，其中一些人对他的发现完全拒绝和否认，包括有名望的病理学家鲁道夫·菲绍夫。

后来，科赫在印度也成功地识别了霍乱病原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成功地证明了长期以来他发现的逗号形状的芽孢杆菌确实就是导致霍乱的病原体，并且它们是通过接触传染的方式传播开来的。从此，细菌学的发展一发而不可收拾，由此在医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科赫的研究是在加尔各答的贫民区里完成的，他面对随时有被传染的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到柏林后，科赫受到了像胜利归来的统帅一样的款待，他向威廉一世汇报了自己的工作，获得了威廉一世授予的“十字勋章”。他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务委员会的成员，柏林的全体医生在一次盛宴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就连先前对科赫的细菌学完全持审慎批判态度的菲绍夫现在也对他表示出赞赏。对这种传染病产生和传播的了解使得人们

对这种疾病的防治以及最终通过注射疫苗的免疫疗法成为可能。

在柏林，他被一所大学聘为卫生学的正教授和卫生学学院的院长。1890年四十六岁的科赫在那里做了一个《关于细菌学研究》的报告，他说：

“如果给一只健康的豚鼠接种一个纯培养的结核芽孢杆菌，那么在通常情况下，接种的伤口会粘在一起并且在最初的几天里看起来是能够愈合的；经过十天至十四天之后才出现一个硬的小结，它很快就会断裂并且直到动物死去时会形成一个溃烂的伤口。

但是，当一只已经被感染结核病的豚鼠被接种了之后，那它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在一个这样的动物身上接种的小伤口开始的时候也会粘在一起，但是不会凝成小结，而是在接下来的几天或者是第二天发生奇特的变化。伤口会逐渐变硬并且呈现出一种更深的颜色，虽然这并不仅限于接种的那一小块地方，而是会在周围直径大约0.5—1公分的范围内扩散开来，并且

会越来越明显,产生变化的皮肤开始坏死,最终逐渐脱落,留下一个表面的小溃疡。这个溃疡通常情况下会很快痊愈,而且相邻的淋巴结不会被感染。

被免疫过的结核芽孢杆菌在健康豚鼠的皮肤上产生的作用和在某些感染结核病的豚鼠皮肤产生的完全不同。不仅活的结核芽孢杆菌会产生如此显著的作用,而且那些被杀死的杆菌也同样如此。开始,我尝试用长时间的低温或者沸点的温度又或者某种化学剂来杀死杆菌,但不论它们是否被杀死,它们产生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

仅仅一年以后,科赫就发现了一种结核病的治疗物质。他说:“这种物质存在于从结核芽孢杆菌的纯培养中提取出来的甘油浓缩物中,用这种物质可以针对结核病运用新的治疗方法。”科赫把这种物质叫做结核菌素。对于结核病的治疗似乎是取得了胜利,罗伯特·科赫同时也被荣誉包围了。但是后来证实,事情要复杂得多,而且至今只是作为实验被运用的结核菌素

对这种可怕的疾病并不是一种万能的治疗物质。科赫对此感到非常失望,而他当时遭受的攻击和批评也深深地打击了他,特别是那些不公正的抨击,因为使用结核菌素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那些进行治疗的医生们没有遵从科赫的嘱咐。这位曾获得皇帝授予十字勋章的科赫(在他之前还没有医生获得此项殊荣)失望地隐退了。他辞去了他的职务到埃及去了一段时间。

接着情况再次发生变化,他重新鼓起勇气,在柏林接任了一所新成立的、研究人员齐全的传染病学院的院长。这是在 1891 年的夏天,在那里他继续进行他的结核病研究。1892 年,科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时霍乱从印度经过波斯和俄国传到了汉堡并在极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开来。几个星期之后汉堡就出现了 17000 例霍乱病例,其中有 8000 人死亡。科赫立即赶往汉堡,并很快找到了主要的传染源,这就是易北河的水。汉堡的居民向其中倾倒他们的废水和粪便,同时又从中提取他们的饮用水:过滤装置里的一个失误导致了霍乱芽孢杆菌的产生。科赫

说：“人们把霍乱喝了进去。”不久以后，科赫便结束了他在汉堡处理瘟疫的工作。人们采取了卫生措施，这些措施对后来也是有益的。几年后，当霍乱又两度威胁到汉堡的时候，人们已经能够防止它的肆虐了。

1890年在科赫柏林的学院里，血清疗法的初步尝试在他的学生兼同事埃米尔·冯·贝林的领导下取得了成功。用这一疗法首先能够成功地对炭疽热进行治疗，后来对白喉的治疗也颇有成效。后来，贝林和他的老师科赫产生了严重分歧。贝林在四十七岁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为了表彰他在血清疗法上、特别是血清疗法针对白喉的应用上所做的贡献。这是诺贝尔奖首次颁发给在医学上做出贡献的人。四年之后的1905年六十二岁的罗伯特·科赫（他又在对失眠和疟疾进行研究）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是为了表彰他在结核病领域所做出的研究和发现。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

“当时，这两兄弟不仅在文学方面，而且在政治上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 兄弟的阅墙之争

——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德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二战期间流亡国外。著有《布登勃洛克一家》、《威尼斯之死》和《魔山》等。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十岁孩提，二十少年，三十而立，四十停滞……”日耳曼语言文学家和童话搜集者雅各布·格林在他著名的《年龄谈》一文中，引用了这段将人生按十年划分的描述。“四十岁停滞”：对于托马斯·曼来说，这句话以奇特的方式吻合了他的情况。这里不是指暂时的休息和放松，也不是如歌德所说的为新的开端所作的准备。不，对于出生于1875年6月6日的托马斯·曼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限制和自我封闭，甚至是一种倒退。这位写出了《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文学家，在一战爆发后，退回到保守甚至反动的立场上，

而比他大四岁的兄弟海因里希·曼则完全相反，持有批评性和自由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无理由指出，托马斯·曼在对德意志民族及其当时的国家体制的认同上、甚至赞同战争这一点上，他都决不是孤立的。正如当时大多数德国民众一样，很多艺术家和文学家也把战争看作一种民族解放，从而被卷入了兴奋和狂热之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又恢复了理智。然而，托马斯·曼对战争的认同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和热情，而是审慎的、有充分依据的。此外，他的认同姗姗来迟，并且——也许正是由于海因里希的激烈反对——持续了较长时间。尽管托马斯·曼最终转向了民主政治、和平主义的观点，但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自己的错误观点所困。这一点常常被美化了。战争结束后，他的思想有时仍带有沙文主义的色彩，这一点在他的一处日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19年4月13日，那天是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托马斯·曼通过电话得知——他这样记录道——慕尼黑“参议会政府被推翻，霍夫



曼政府控制了局势”；霍夫曼政府是一个以帝国军队残余和志愿军部队为依托的军事政权。日记又继续写道：“部分议员逃走，部分被士兵逮捕。”在那个日记末尾，托马斯·曼再次回到这一事件上：

“我欢迎将参议会政府推翻。很多人相信他们还会再回来，认为这是不可阻挡的，我也很同意这一观点。但在这个问题上，理论和现实之间有很大差别。我憎恨那些不负责任的工人议员，他们败坏了德意志精神，把一切都搞得乱了套。我不反对把他们当作祸害枪毙，但人们不会这样做。”

如果联想到前文叙述过的阿登纳，他在科隆和工人、士兵议员共同工作，用民主方式致力于这座城市的重建和安宁，那么托马斯·曼这种要把下台的慕尼黑工人议员当作“祸害”消灭的想法，便具有了可怕的极端性，特别是当它在一种道德和理想的背景下出现的时候——“他们败坏了德意志精神！”

托马斯·曼对战争的维护也正是基于这一

背景。自从其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这个四十多岁的作家就在慕尼黑波辛格街一号的一座宽敞的房子里，过着富裕的、几近奢华的市民生活。他认为，只有这场战争能够阻止德国精神和德国文化的衰落。他在给哥哥海因里希的信中写道：“完全没有想到能够经历如此伟大的事件，人们对此难道不应该心存感激吗？”他所指是那场“伟大的、极其正派的、甚至是庄严的人民战争”。

由于德国军队入侵中立的比利时，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一篇文章中呼吁德国知识分子谴责政府。当时许多德国作家（如卡尔·沃尔夫斯凯尔、盖哈特·豪普特曼、弗里德里希·贡尔多夫、罗伯特·穆西尔、罗伯特·博尔夏特、施特凡·格奥尔格）激烈地为德国利益辩护，其中也包括托马斯·曼。在接下来的数月乃至数年中，他多次发表文章维护德国的传统和文化，反对西方“文明”。11月他发表了《战争中的思考》一文，其中写道：“做一个德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像做英国人那样舒适，也远没有法

国人生活得那样清楚明朗……，但要是谁希望为了人道主义、理性主义甚至是伪善，让德国方式从地球上消失，那他就是在亵渎。”托马斯·曼认为，只有德国的胜利才能使德国文化生存下去。他将文化等同于德国精神和德国灵魂。文化不能沦落为法国式的“理性”，也不能变成英国式的“虚伪”，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是与真正的德国文化相对立的。

对托马斯·曼来说，文明的概念中包含了民主的概念；对于他和大多数生活在帝制德国的人来说，民主和文化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自从托马斯在信中颂扬“庄严的人民战争”，他的哥哥海因里希·曼就将两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结束。在他看来，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早在几年前，他和弟弟的立场便有了距离。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不点名地把托马斯归入了“背叛的文学家”的行列。对于这些人，他在《精神与行动》一文中写道：“他们把人民的生命仅仅当做自己的伟大经历的象征……，他们不了解民主，蔑视民主。”

半个多世纪以后,托马斯·曼的遗孀卡蒂亚在她的《无字的回忆录》中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这场兄弟之争:“当时,这两兄弟不仅在文学方面,而且在政治上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海因里希完全趋向于法国-拉丁方向,而我的丈夫的文化根源则在德国,绝对是德国式的。他和法国文学没有紧密的关系,他看法语也相当吃力,读得不多……”

1915年2月,托马斯·曼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腓特烈与1756年的大联盟——那天和那几小时的概要》。副标题清楚地说明,对于腓特烈大帝入侵奥属的西里西亚、在对抗奥地利以及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结盟的欧洲国家的七年战争中坚持到底作者采取了何种态度。这些对当时战争的描述被当作德意志帝国在一战爆发前政治状况的积极的贡献,被当作一种比喻,用来论证新的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托马斯·曼所理解的“正义”不是司法和国际法意义上的。托马斯·曼承认,司法意义上的正义不适用腓特烈大帝入侵西里西亚,因为它违反了法律。

托马斯·曼认为,“如果正义是指一种协议,指多数人的评判,指‘人类’的声音,那么国王不具有正义。他的正义是崛起势力的权利。”

托马斯·曼也用“崛起势力的权利”来为腓特烈入侵中立国萨克森辩护,它也同样适用于当时派兵占领中立国比利时的德意志帝国。托马斯·曼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理解为腓特烈大帝战争的延续。托马斯·曼毫不怀疑,腓特烈发起的战争是必要和有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当时结盟的欧洲国家才没能战胜他。关于腓特烈他写道:

“有时人们会认为,他是一个给全世界带来仇恨和厌恶的魔鬼,他欺骗了全世界,他是一个没有性别的、阴险的恶魔。但是,成千上万的人想干掉他的努力是白费的,因为他的出现、他被派遣来是为了完成伟大的、必要的凡间事务。然后他将留下后代,再度消失。”

伟大的、必要的凡间事务——它们在德国历史中得以延续:“必须让普鲁士,让德国走它的路,——这条道路现在和今后都将崎岖不平、

前途未卜,并且充满发人深省的转折,没有一个民族走过的道路可以与之相比。”

即使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仍有数百万德国人对这条道路的合法性深信不疑,他们相信这条道路将顺应天意,使德国变得强大(此时的托马斯·曼早已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条所谓的崎岖的上升之路究竟将通向何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臣仆》的作者海因里希·曼早在当时就十分清楚。在散文《左拉》中,他对弟弟对于德意志民族权力和正义所做的设想进行了回应:“但是,若权力不是正义,不是植根于所尽义务、斗争实现的理想以及提升人道精神的良知中的最深刻的正义,那权力是什么?一个纯粹建立在暴力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由、公正和真实基础上的帝国,一个只知道命令与服从、赚钱与剥削、作为人却从未受到尊重的帝国,是不可能获胜的……”

托马斯·曼把哥哥的这篇关于左拉的回应散文当作一种人身攻击。他对于这篇散文的反应方才显示出他在错误的泥潭中陷得多深。当

然，他也觉得自己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特别是——据他的妻子后来说——文章的开头：“这篇不幸的散文，它的开头的确很伤感情：‘这是那些很早就才思枯竭的人的事情，他们早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表现得自负傲慢。’没有人像我丈夫自己那样清楚地注意到，这里所指的就是他。这给他造成难以言喻的伤害，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其实原本没有必要……”

托马斯以《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看法》一文来回应海因里希的《左拉》散文。他花了很长时间，大约两年时间来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18年，充斥着对其兄长仇恨的诋毁。在《看法》发表之前，即1917年底，海因里希做出了书面的和解建议。但被当时四十二岁的托马斯拒绝了：“我忍受两年之久的痛苦和斗争，荒废了我心爱的计划，强迫自己在艺术上沉寂无声，不断地反思，不断地研究和比较自己……不是为了你给了我这封没有一行不充斥着自以为是的信后，我就放弃与你的争论。”托马斯打算将这场阅墙之争坚持到最后：“让这场兄弟之情的

悲剧演完直至圆满结束吧……这种状况不是我造成的，我憎恶它。可我们只得尽可能坚持到最后。”

显然，他不打算放弃发表他的《看法》，也不打算再进行修改。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他哥哥描述成政治倾向化的文人，其实就是说他是非文学家；只有非政治倾向化的文学家才是真正与文化相连的，本身才是文化的创造者。也就是说，他认为，非政治化是是否有创造性的基本原则。

海因里希更具有批评性，他早就把弟弟的这一点观点理解为他与现实问题的回避，是不可容忍的对他和其他人的轻视和蔑视。由于托马斯拒绝了他的和解建议，他在回信中告诫弟弟道：“你对于与你相左的观点完全缺乏尊敬，甚至可以说是鄙视，简单地说，你没有能力理解别人非常认真严肃的观点。”这封写于1918年1月5日的未寄出的信中还写道：“没有能力去严肃地对待他人的想法，最终会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如前所述，你认为我表示单纯的友



谊的信是我的胜利！何来胜利？难道那废墟中的世界和成千上万沉寂于地下的尸体正合我意？这是一种狡辩！只有那些所谓的思想家才会满意！我不是那种把大众的痛苦和死亡当作自己精神愉悦源泉的人，我不是……”

如前文所述，这封信从未寄出，它始终只是未发表的草稿。

卡蒂亚·曼在很多年以后说：“很难说谁在这场兄弟之争中更痛苦。”私人的、日常的事务也搅合了进来，这不足为奇。比如有一次托马斯指责他哥哥很久以前向他借的钱一直没还。当时，托马斯的经济状况比海因里希好，一方面是由于《布登勃洛克一家》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定期从岳父那里得到对庞大的家用开支的补贴。借钱给哥哥不会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但他在争吵时提起这件事，而且还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你是一个人，没有四个孩子，没有四个佣人，没有乡村别墅，在城里没有 5000 马克的住房，只要你愿意，……马上偿还欠我的那部分钱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尤

其让托马斯生气的是，海因里希用借的这笔钱给自己买了一件毛皮大衣。

这场兄弟之争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以后。显然托马斯不愿承认他在所有的事情上都错了。这说明——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这里如此详尽地描述了这场争端——即使如此智慧、有教养、聪明的中年人，也会以何种狭隘的顽固沉湎于自己的错误中，并且拒不承认这一点，尽管他后来早就认识和克服了这些错误。早在 1915 年 3 月，即《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看法》发表前很长时间，托马斯·曼就在一封给奥地利的和平主义者保罗·阿曼的信中写道：“我所希望的是，这场战争带来的必然结果，即克制政治化的普鲁士和推进德国的民主化，它将会使德国摆脱黑暗而又不变得肤浅，使它与现实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明朗。”

使人感到非常惊讶的是，托马斯·曼又用了许多年才公开赞同并且也在海因里希面前承认了这一立场。和哥哥的和解是在 1922 年初，海因里希生了病而且必须动手术。托马斯去看望

了这位正在调养的病人,兄弟之争就此化解,甚至像两个人说好的那样永远化解了。托马斯现在也认同了哥哥这样的观点,虽然他在魏玛共和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我认为,现今这样文化人高傲地俯视社会和社会政治舆论,是一种错误的、有悖生命的行为。政治的和社会的都是属于人道的范畴。”

当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握手言欢时,他自己已经四十六岁了。1921年6月6日晚,星期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四十六岁生日。首先我可以说,相比较从前的生日这个生日我是怀着一种更好、更开朗的心情来庆祝的。天气非常温暖和湿润。卡蒂亚在早饭前送了我一些礼物:一个漂亮而且很实用的在盥洗台上用的热水器,此外还有一些信件、贺卡,还有一封妈妈的感人的信。两个孩子戴着花环。小伊丽莎白朗诵了一首卡蒂亚写的小诗……”下午他和卡蒂亚、四个稍大一点的孩子还有保姆一起去皇家剧院看《卡门》。他在日记中继续写道:“指挥是非常年轻的管弦乐队助理指挥伯姆。”

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奥地利指挥家卡尔·伯姆。四十六岁的生日是这样结束的：“很累，很紧张，孩子们像往常那样，老套的闲话和保姆絮絮叨叨的废话让人很烦躁，一切都与机智风趣无关。相当糟糕的晚餐；香槟是温热的，根本不能喝……”

托马斯·曼已经很有名气了。虽然从1901年他创作了《布登勃洛克一家》这本书之后还没有写过什么长篇巨著，但是他出版了好几本中篇小说，有小说《王爷殿下》、短篇小说《威尼斯之死》、随笔《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看法》、田园诗《主人与狗》和《孩子们的歌唱》。多年来托马斯·曼还特别致力于《魔山》的创作，有时也会进行《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的写作。

他收入很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他的书印数非常大，还有许多国外不同语言的版本。尽管如此，过了不惑之年的他有时还是会为家庭的花费担心，因为他要供养六个孩子、四个仆人并维持经常有许多客人来访的巨大的家庭，开销很大。1920年5月他写道：“该缴的税已经

申报了,尽管我们逃掉了很多,但这还是花掉了我们差不多2万马克。”

当然,那时候的德国马克已经不像战前那样值钱了。比如说,二十年代中期托马斯·曼不得不花上55马克来买一顶草帽,他穿的一双靴子花了他500马克;给卡蒂亚买的一辆自行车花了1525马克。同时,10马克对于托马斯·曼来说也可算得上是一大笔钱了。在他四十五岁生日的那个晚上,(他的妻子当时正在外地疗养)他在一张装饰了玫瑰花的长桌上宴请了“枢密大臣马克斯和妻子,儿子和侄女,还有卡蒂亚的父母”,他们喝掉了一瓶64马克的香槟酒。他在日记中写道:“侍从在为我们服务中得到了10马克小费。”

妻子和孩子给托马斯·曼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漂亮的背包、糖果、手绢和袜子。“岳父岳母带来了香烟、巧克力、一个打不着的打火机和一個银制的裁书器。”最后,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早就期待着枢密大臣的高谈阔论,而且我已准备好了回答。但是,这方面的交流却没有出现。”

托马斯·曼工作很努力,但是,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工作其实并没有真正地投入,也没有很大的热情。与此相反,他感到紧张、烦躁并且几乎总是在忍受着一些不舒服的东西,他要忍受燥热风和所有可能出现的天气状况,如果不服安眠药他很少能睡得安稳,他还时常抱怨消化困难,有时还有头部充血,这些使他很快就感觉疲惫而且很容易受到伤害。他总觉得他的写作进展缓慢。早在他四十四岁生日那天晚上他就写道:“这一年我写完了《主人与狗》和《孩子们的歌唱》。对此,我应该感到满意。但愿这一年《魔山》的写作能够基本结束,不要再有太多的工作留下!”

但是,《魔山》一书的进展也不是那么顺利,它于1924年才得以出版。1921年6月3日,就在他四十六岁生日的前几天,托马斯·曼给学生们做了一个报告。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报告后在维特尔的酒店和瓦塞尔曼夫妇、蓬滕夫妇,还有马滕夫妇一起吃晚饭,马滕夫妇谈到了诺贝尔奖在德国建立联系的事,据说我也在诺贝

尔奖候选名单中。”不过,当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已经是八年后的事了。不管怎样,能够被人公开谈论和这样一个奖有联系使他感觉非常舒服。当他 1929 年五十四岁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据说他曾经说过:“是的,总会有人获奖的。我认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取得的荣誉。”卡蒂亚后来回忆说,无论如何,她相信他应该更早些获得诺贝尔奖。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不管魔鬼怎么样，如果  
我能够放弃一切，那么我  
一定要在我死之前和我的  
卡塔琳娜结婚。”



# “拐骗修女”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

改革运动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

宗创始人，公布《九十五条论纲》，

将《圣经》翻译成德文。

马丁·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出生于艾斯莱本，四十岁时就早已为全世界所熟悉：一方面是作为从罗马天主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宗教改革者，另一方面是作为不顺从的、着了魔的僧侣。路德根本不是有些传说中声称的那样是一个“贫穷的矿工”的儿子，而是一个颇为成功的矿业主的儿子。他父亲和别人共同拥有一个冶炼厂，自己还有一栋房产和一些钱。这位容易发怒的父亲对路德的管教是严厉而且独断的，路德接受的学校教育也是很严格的。路德全家于1484年移居到了曼斯菲尔德，五岁的路德被送到了高级中学（十三世纪后以拉丁文课为主课的高

级中学。)。十四岁的时候路德就读于“共同生活兄弟会”学校,这是一个在马格德堡的类似兄弟会的教会团体。一年之后,全家又搬到埃森纳赫,他也转到了圣乔治教士学校。还不满十八岁的路德开始了在埃尔富特大学人文科学基础阶段的学习,他1505毕业时被授予文科硕士学位。所有这些努力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法学家,就像他父亲一开始就希望的那样。接着路德很快就开始了法律的学习。但两个月之后,他在埃尔富特附近差点儿被闪电击毙,就此他中断了学业。为了成为僧侣,他进入了埃尔富特奥古斯丁隐士会。

他不再学习法律,而是转而学习神学,并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他被授予神甫之职并被任命为诠释圣经的教授。在对于一些基本的信仰问题思考后,路德产生了背离罗马天主教的信念。当他认识到,他那个时代普遍使用的赎罪方法和真正的信仰不一致的时候,他写下了反对滥用“赎罪券”(不是针对赎罪本身)的《九十五条论纲》。这是在1517年的10月,当时路德三十三

Der Papstfisch zu Rom



Das Munchkalb zu freyberg



岁。关于他把论纲张贴到了维滕堡宫廷教堂的大门上一说,实际上只是传说。路德自己反复地声明,1517年10月31日他只是把这些观点寄给了几个负责管理此事的主教。当他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之后,他把论纲又寄给了几个朋友。后来这些论纲通过他们才得以公之于众。这件事导致的后果是按照天主教教规对路德进行的一次诉讼,教皇利奥十世发出了逐出教会的通谕,路德被传唤到沃尔姆斯的德意志帝国议会,在那里他拒绝收回他的论纲和有关文章。这样,德国皇帝宣布剥夺了他在瓦特堡逗留期间的法律保护。在瓦特堡他用假名生活了10个月并且在那里开始了《新约》的德语翻译工作。

在这些年和接下来的几年里,四十出头的路德表现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干劲和活力。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完成定量的工作。但是,他几乎无法安静地工作,因为不时地遭受极大的威胁,经常被别人攻击,而且是几乎毫无防备地遭到别人语言上的攻击。然而,这使得他内心萌发出了更为巨大的力量,开始真正地去生活,去

过一种没有修道院的强制和约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一种可以自己做主、可以保留自己观点的生活。他关心一切可能需要关心的事，同时也被卷入了很多其它事情当中。这并不奇怪，因为许多人都寻求他的帮助。因为他力量有限，不能帮助所有有求于他的人们，他不得不让其中的一些人失望。比如，他不愿意参与对当时德国起义农民的支持。

但是有一天，他却参与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拐骗修女行动”。这是在 1523 年的 4 月份，12 个尼姆深教团修道院的修女——她们全都来自贵族家庭——请求她们的父母和亲戚让她们从“修女”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但是却没有什麼结果。路德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决定帮助她们。路德的朋友莱昂哈德·科佩议员定期给那个修道院送东西，也许是他告诉了路德这些修女们想重新过上普通人生活的愿望。可以肯定的是，1523 年 4 月 4 日科佩趁运送东西之际，用几个修道院的空桶把那 12 个修女藏在里面带到了维滕堡。中途有三个修女下车回家了，其余的人在维

滕堡得到了路德的帮助。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路德表示完全支持这次解救修女的行动并发表了一篇文章《少女想离开神圣修道院的原因和答案》。他帮助修女们在维滕堡市民家里找到暂时的住处，他给她们的家里写信并且尽力帮那些想结婚的人寻找合适的丈夫。其中一位年轻的修女叫卡塔琳娜·冯·博拉，刚刚二十四岁，出生于萨克森，来自一个古老没落的贵族家庭。她十岁时就进了修道院，十六岁时成了修女。在维滕堡她寄宿在卢卡斯·格拉纳赫家里。不久就有两个应征者请求和她结婚：一个是来自奥尔拉明德的牧师，另一个是来自纽伦堡的城市贵族的儿子。路德有一天给后者写了一封信：“如果你还想要得到卡塔琳娜的话，那你就必须抓紧了。否则她就会被别的求婚者抢去了。她对你的爱始终都没有消失。我会像为其他婚姻一样，也会为你们这个结合而感到高兴的。”但是，这个纽伦堡人这段时间和别人有了婚约，而卡塔琳娜又不愿意嫁给那个牧师。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路德有了

这样一个想法：他为什么不能自己来娶冯·博拉小姐做妻子呢。或者更确切点说，是卡塔琳娜使他有了这个念头。

路德和他的父母以及朋友一起商量了这件事。他的父亲非常赞成。在另外两个儿子去世之后，他早就表达出希望马丁结婚，使祖宗的香火得以延续的愿望。后来路德也就依照了父亲的愿望做了。路德的朋友和宗教改革的战友对于他——这个从前的僧侣——计划与一个逃跑的修女结婚并没有显得很兴奋。该国的法律顾问说道：“如果这个僧侣娶了一个妻子，那么世人以及魔鬼都会发笑。而他自己也会把他迄今为止的一切努力都给毁了。”但是，路德坚持自己的立场：“不管魔鬼怎么样，如果我能够放弃一切，那么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和我的卡塔琳娜结婚。我听说农民起义还在继续进行。我希望他们不要夺走我的勇气和欢乐，天使应该高兴而魔鬼将会哭泣。”

他下定了决心要娶卡塔琳娜·冯·博拉为妻。这不是出于激情澎湃的爱情，而更多的

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出于对一个孤独的年轻女人的同情。他之所以结婚,其中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但是,路德的研究者汉斯·莉利亚却是这样认为的:“这也是他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他想要通过他的婚姻来对生活 and 上帝的规则表示赞同。同时他所做的事情对其他人来说是个证明,这更使他们感到愧疚。”

订婚仪式于 1525 年 6 月 13 日在维滕堡举行。路德四十一岁,卡塔琳娜二十六岁。十四天后他们隆重地举行了婚礼,很多朋友都来了。但是,路德的朋友梅兰希通写道:“在这段不幸的日子里,当德国需要他的力量的时候,他通过这一不幸的行为损害了他的威望。”他思考着,是什么促使路德走出了这一步:“也许他有了激情、起了爱慕之心。我想,是人的本能促使他结婚的。”后来,他又补充道:“让我们冷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吧!。因为圣经上说,婚姻是一种可尊敬的生活。我也希望婚姻能让他更加严肃并且使他放弃那些常常遭到我们谴责的闹剧。上帝



给我们指出他的某些失误，是为了让我们既不要相信一个人的名声也不要相信他的威望，而只要相信他的观点。人们不可以因为大师的一次的失足而咒骂他的理论。”

路德把梅兰希通称作“大师的失足”换了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结合的伟大的事情。”关于他自己和他的卡塔琳娜，他回答道：“我爱她不是出于激烈热切的感情，而是出于尊敬。我只希望能再活一段时间，我不想拒绝父亲交给我的最后的责任：传宗接代并且通过行动来支持我的理论。”

婚后不久，路德就发现妻子很任性，但他们的结合还是一段幸福的婚姻。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越来越多地称呼她“克特先生”，有时候也称她“博士先生”。有一次他给她写信：“如果我还有机会恢复自由之身的话，我要用石头给自己雕刻一个听话的妻子。因为，我怀疑这世上还有没有听话的女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妻子的优点以及她是如何把家务和家庭开销管理得井井有条的。

路德得到了他的君主送给他的一座的修道院,以此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时候的他已经不再有教授的薪水了。这座修道院已经废弃了。卡塔琳娜·冯·博拉让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经营。对此,赫尔穆特·迪瓦尔德在他的《路德传》里有这样的文字:“几年后,这座修道院有了30个常客,路德家拥有三个大花园,他们还有田地和池塘。卡塔琳娜甚至还搞起了畜牧业,养了一些马、奶牛、山羊。她还饲养蜜蜂,把修道院的酿酒业重新启动并且酿造出了让维滕堡受到上帝恩赐的基督教徒们十分喜爱的酒,就像沙漠中那些忍饥挨饿的人喜爱吗哪(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那样。”

除此之外,她还为丈夫生了很多孩子,在路德生命中第五个十年里头,加上最后一个孩子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约翰(1526),伊丽莎白(1527),玛格达莱娜(1529),马丁(1531),保罗(1533)和玛格丽特(1534)。伊丽莎白出生仅8个月就夭折了。后来玛格达莱娜也在十三岁的时候死了。

当路德刚四十岁时，他就开始着手研究一个至今仍然很现实的问题，这就是关于青少年教育的问题。路德那时就认为，和在学校教育上投入的钱相比，在军备和道路修筑上花费的资金无论如何是太多了。所以，他撰写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直接针对“德意志邦国的政府议员们”。尽管这期间已经过了四百多年，但这篇文章原则上也还是有现实意义的。路德写道：“我们清楚地知道，现在德意志的许多地方学校是每况愈下，高等学校变得越来越差，修道院也减少了……没有人，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多么有害、多么残酷的事。这一切是在悄悄进行以致于没有人觉察到。当人们发现问题后，不是首先提出建议、采取措施，而是想着推委责任。人们害怕土耳其人的进攻、害怕战争和水荒；因为大家知道什么是损失和收益。但是，这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去担忧，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尽管如此，如果人们在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上投入一个古尔登（德国古代金、银币名。）的话，那么在这里就是投入一百个古尔

登也是合情合理的,以此来教育培养孩子,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他恳请议员们和所有德意志市民:

“所以,我请求你们大家,我亲爱的议员和朋友们,看在上帝的份上也为了贫苦的孩子,不要像不少人那样轻视这件事。我们对年轻人的帮助和劝告,是一个对耶稣基督和整个世界来说都很重要的严肃而伟大的事业。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和别人也得到了帮助和劝告。亲爱的议员们,我们每年在购买大炮、建造道路、大坝以及类似的数不胜数的工程上花费那么多钱,难道我们就不能为贫困的青少年雇请一、两个合适的人来做校长?”

路德还认为,我们不应该仅仅依赖那些负责管理此事的人,我们自己也应该行动起来,为此做一些事:“每个市民都应该行动起来。如果他到目前为止不得不在赎罪券、弥撒、捐赠、遗嘱、周年忌日、托钵僧、教会团体、徒步朝圣以及其它一些事情上投入了很多家当并且通过上帝的恩惠而从此免于这样的掠夺和付出的话,那

么今后他就应该为了向上帝表示感谢和敬意，拿出一部分钱给学校，用于培养贫苦的孩子们。这将会是一件造福于民的好事……”

路德认为学校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因为父母没有能力自己教导他们的孩子：“大部分父母不知道应该如何教育和指导孩子。因为他们自己除了填饱肚子之外什么也没学过。需要有专门的人来给孩子们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和培养。”

路德认为，一些特别需要教授外语的学校还是应该有别于其它学校。那些学校只知道棍棒式教育，而从来不会用愉快式教育。他把它们称作“魔鬼学校”。“是啊，除了让他们成为蠢驴、呆木头和固执己见的人，人们在高等学校和修道院还学了些什么呢？一个读了20年、甚至40年书的人，却还是既不会拉丁语也不会德语，更不用说那些可耻的放荡的生活了。高贵的青年在这样的生活中变得堕落。——我希望高等学校和修道院保持他们原有的特色，这样孩子们就可以继续原来的学习和生活方式，我更希望

孩子们经过学习变得更加聪明睿智。这是我很认真的想法、请求和希望,这些驴厩般或者说魔鬼般的学校要么被彻底废除,要么就把它们转变成基督学校,要么……”

不惑之年的路德认为,人们应该思考一下了,不要再用大棒去折磨那些上学的孩子们,“年轻一代有其自身的想法和发展方向,应该让他们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他质疑道:“为什么不为孩子们设立这样的学校并且为他们开设这样的课程呢?特别是现在由于上帝的恩惠而将一切如此安排,让孩子们能够充满兴趣如同在玩耍中学习,可以学习语言或是别的知识,如历史等……”

这时的路德还没有成为父亲,他继续说道:“如果我有孩子的话……,他们不会只听我讲语言和历史,而是也会学习唱歌以及音乐和数学的知识。没有这些知识语言和历史也变得毫无意义了。从前希腊人就这样教育他们的孩子,通过这样的教育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非常出名,而且非常能干。是啊,我现在感到多么的遗憾

啊,当初没有去读更多的诗歌和历史,也没有人来教我这些东西……”

路德是在这种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来教育他自己的孩子的,这种教育理念在他那个时代,也就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过渡时期还是全新的。路德把这一理念首先用在了儿子们的身上,并且效果很好。路德的大儿子约翰成为了普鲁士阿尔布雷希特公爵的参事,二儿子马丁成了神学家,老三成了萨克森州的御医。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关键是勤奋；因为这些不仅可以提供生活的来源，而且也可以实现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



# 实现独一无二的价值

——席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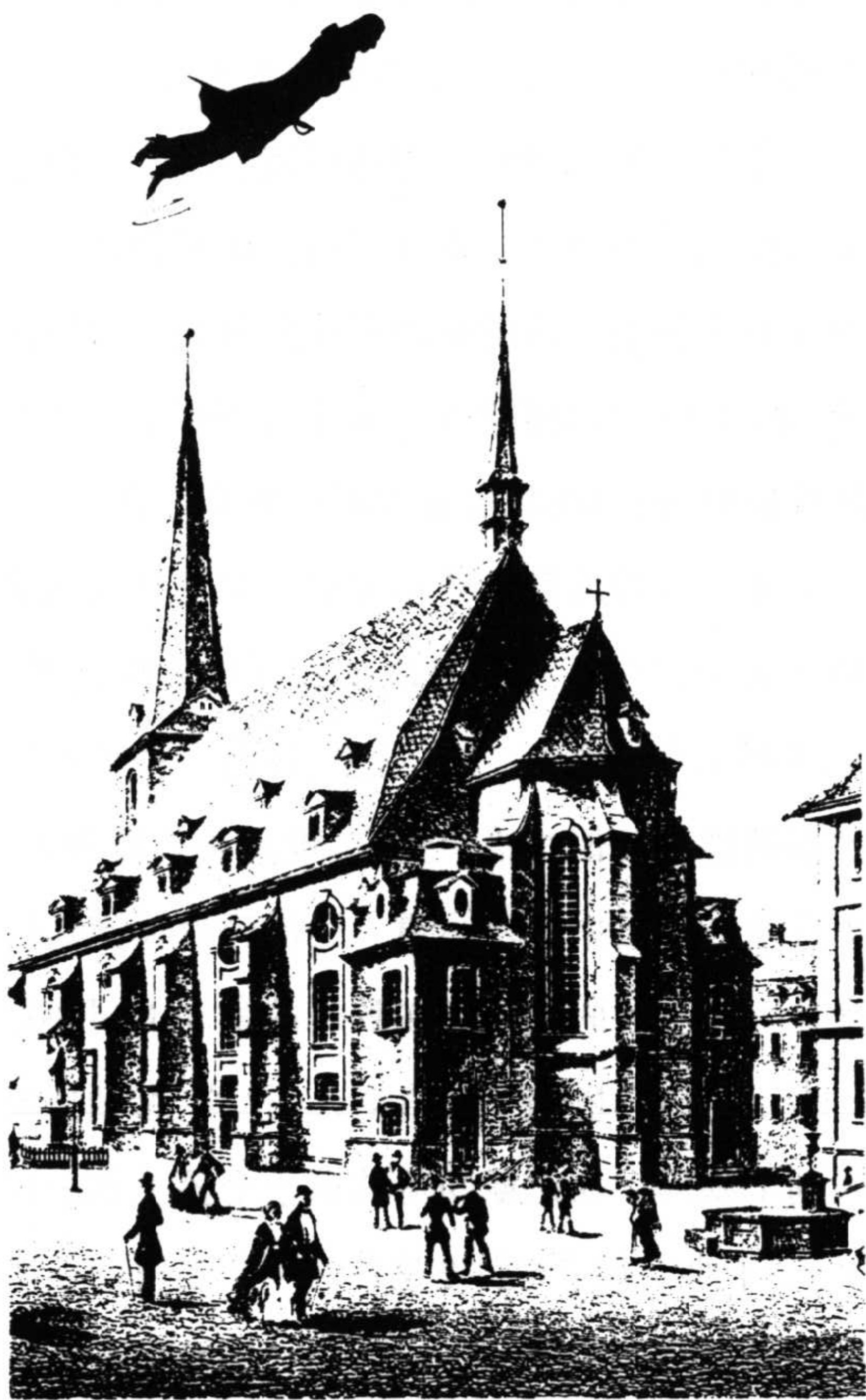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德国著名戏剧家、诗人、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著有剧本《华伦斯坦》、《阴谋与爱情》、《威廉·退尔》等，诗作《欢乐颂》及史学著作《三十年战争史》等。

经过多年的艰苦工作，四十多岁的席勒完成了他那部伟大的三幕戏剧《华伦斯坦》。那时他已经结了婚并且是两个(不久以后就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但是，他的经济状况却不太好。他那部巨著刚一结束，他就给歌德写信：“我早就开始害怕我的作品完成的那个时刻，虽然这一刻是我所热切盼望的。实际上，我感觉我现在的自由要比先前的苦役还要糟糕。长时间以来吸引并且左右我的工作现在一下子都不见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漫无目的地处在一个真空的房

间里。而且我仿佛绝对不可能再去创作什么东西了，在我没有把我的思想再次集中到富有希望的素材上之前，我是不会平静下来的……”

很快席勒就把这个想法付诸行动了。没过多久他就告诉歌德：“在这期间，我在创作一个关于女皇伊丽莎白的统治史并且开始了对玛丽亚·斯图亚特审判的研究。从中我得到了一些悲剧性题材，同时我相信这些素材很有价值。”

那个时候席勒生活在耶拿。但是自从他辞掉了大学里的工作以及历史教授的职位之后，他感到非常得孤立。“在这里，我有一种置身于沙漠的感觉”，他在给萨克森-魏玛的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信中这样写道。公爵建议他到魏玛来住上一段时间，并且在歌德的策动下同意每年多给他 200 塔勒和四筐柴火。这样，席勒把家搬到了魏玛，在此期间他的第三个孩子也出世了，一个小女孩。他们先是住在一个临时的住所里，后来搬进了一幢自己的房子，这幢房子是他把耶拿的房子折价卖掉以后花了 2400 塔勒买的。他认为卖的时候还吃了点儿亏。歌德在他换



房子的过程中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此时也向他表示祝贺：“首先对于你乔迁之事的顺利进行致以我衷心的祝贺！我很高兴您找到了一处舒适的、向阳的并且周围绿草茵茵的房子。”席勒回复道：“我们搬进来已经六天了，可还是非常乱，不过我在早晨的那几个小时可以集中精力做一些工作，我希望不久以后，一切就可以井井有条了。”

他开始走上正轨，正如他做事总是那么有条不紊一样。席勒一直没有能从1791年的那场重病中完全恢复过来，他很容易患上感冒，还经常感到呼吸困难，同时他还有很多的烦恼。尽管如此，他工作起来还是很努力而且生活很有规律。同年，他完成了悲剧《玛丽亚·斯图亚特》，接下来是《奥尔良的姑娘》。此外他还完成了改编的作品《图兰朵》和《麦克白》以及由他的《唐·卡洛斯》和歌德的《伊菲格涅亚》改编的剧本。接下来他还翻译了法语的《墨西拿的新娘》，创作了《威廉·退尔》；他还写了很多诗歌，评论文章以及论文《论崇高》。“关键是勤奋；因为这些不仅

可以提供生活的来源，而且也可以实现一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席勒这样写道。

但是，他的努力并不是每次都能给他带来荣誉和赞赏（四十二岁时，他被封为贵族），常常也会给他带来烦恼。比如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坚决不同意《玛丽亚·斯图亚特》里关于晚餐那一幕的创作，要求席勒做改动。席勒非常愤怒地写道：“我要写一部一个女人被虐待的戏剧，他们不看也得看！”公爵还强烈阻挠《奥尔良的姑娘》的上演并且把演出至少推迟了一年半。对于如此的阻挠和阴谋，席勒感到非常恼火。1804年春天，他给他的内弟写了一封信：“我越来越不喜欢这里了，我十分不愿意死在魏玛。只是我还没有决定要去哪里。”

其实，导致不惑之年的席勒如此不满的根本原因是他那没有保障的经济状况。枢密官席勒每年从魏玛宫廷得到400塔勒的报酬，而此时歌德的薪水却达到了3000塔勒。当初为了买那幢房子席勒还不得不向别人借钱。当他的妻子怀上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席勒就一直在做经

济上的预算,甚至一直预计到 1809 年他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如果我的身体坚持到五十岁就好了”,他写道。

四十四岁的席勒请求歌德的帮助:“为了能在这儿体面地生活,我每年需要 2000 塔勒。到目前为止,我的写作收入有 1400 至 1500 塔勒左右。如果固定收入只能定为 1000 塔勒的话,那我希望我每年的收入能增加到 1000 塔勒。如果情况不允许把我目前的薪水从 400 塔勒立刻增加到 1000 塔勒,那么我希望公爵能友善地批准把我现在的收入提高到 800 塔勒,并给我几年之后可以增加到 1000 塔勒的希望。请您告诉我,我最好的朋友,您是了解我的情况和这里的状况的,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您是否认为我可以以这样的条件去向公爵解释呢?请坦白地告诉我。”

席勒最终敢于考虑将他的薪水加倍(甚至更多)这件事是与一个来自柏林的机会有关的。虽然其中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柏林许诺给他每年 3000 塔勒的薪

水和一辆华丽的宫廷马车。但席勒还是决定留在魏玛，在那里公爵真的将他的薪水提高到了800塔勒。尽管席勒的写作收入也不断提高，他还是担心他家庭的未来。也许他预感到，他在世的时间不长了。他于1805年5月9日在魏玛去世，享年四十五岁。



**萨尔瓦多·达利**

**Salvador Dali**

**1904—1989**

“当我在吃我特别喜欢  
的海鲜时，我对自己说：‘我  
没有死。我活着，我活着！’  
我馋得连口水都要加倍地  
流出来了……”



# 馋得流口水

——萨尔瓦多·达利

萨尔瓦多·达利：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代表作有表现幻想境界的《记忆的永恒》等。

早在基督教教义产生之前很多人就有了这样的观点，即死亡不能结束生命，生命一定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也许那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切丑恶的、一切欠缺的，一切尘世的疑惑都随着死亡而不复存在了。来世的生命越是美好，人们就越容易舍弃尘世。像基督教所教导的那样，死亡可以通向原本的、真实的生命，但是死亡本身还是很难被当作一种快乐，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马丁·路德那里已有所了解。

一般情况下，活得比较长的人，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曾经活了很长时间的人会被认为是比

较幸运的。人们永远无法预知自己寿命的长短，而总是在回顾一生的时候才知道。没有一个四十岁的人知道他是否能够活到五十岁，就如同他三十岁的时候不知道自己那时能否活到四十岁一样。对于每一个生命来说，它都有可能就在下一个瞬间结束。所以每个眷恋生命的人都必须好好地活着，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千万不要试图把生活推迟到将来，推迟到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的退休以后。这当然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却总是被轻易地忘掉。

萨尔瓦多·达利在他的书和日记、还有绘画里他经常承认他对于死亡和时间消逝的恐惧。有一次，已步入中年的他说：“我经常想到死亡；我不断地思考和研究死亡这个问题。通过把它的精神融进我的梦里、我的思想、我的激情、我的感受，融进我的肉体且深入骨髓，以此将死亡混杂到我所有的创造中并对之进行不断的加工。我越是强烈地意识到存在的伟大，就越能感受到死亡的临近。这种感受越是得到肯定的证实，我就越是活得轻松，我喜悦的心情就越强

烈。”

达利,这个自我主义者,此时并没有考虑到来世。尽管他是天主教教徒,但他还是承认:“无神论的父亲对我的影响以及我接受的唯物主义教育都妨碍我毫无顾忌地去相信永恒的生命和肉体的复活。”多年以来,达利一直十分严肃地用一种观点来安慰自己,那就是可以让人把自己冷冻起来,以便一百年或者两百年之后能够重新被唤醒。那时,达利正巧住在一个墓地旁边,他惟一考虑的就是他那短暂的生命。他说:

“如果我说我经常想到死亡这个问题,那是片面的。我拥有美妙的现在,特别是在吃饭的那段时间里。没有一顿饭,死亡不是清清楚楚地向我展示它的现实性、合法性。当烤沙丁鱼的香味飘进我鼻子的时候,我面对着墓地,我内心全部的喜悦就处在面临这种死亡的意识中,我的口福在变大,我的胃口在提升。当我在吃我特别喜欢的海鲜时,我对自己说:‘我没有死。我活着,我活着!’我馋得连口水都要加倍地流出来了……”



戈特霍尔德·埃

弗拉伊姆·莱辛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

“我多么想和其他人一样拥有这幸福的一切！”

# 四十不惑？

——莱辛

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

辛：德国剧作家、评论家、哲学家和

美学家。主要著作有《汉堡剧评》、

《拉奥孔》、《爱米丽亚·迹洛蒂》、

《智者纳旦》等。

1729年1月22日出生于卡门茨（萨克森州）的作家和诗人戈特霍尔德·埃弗拉伊姆·莱辛在四十岁的时候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并且后来非常有名。他十九岁时选择了自由作家这个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那时很少有人有勇气做出这样的选择。后来，已届不惑之年的他生活还是没有保障。莱辛在汉堡做了三年戏剧顾问之后，又在沃尔夫比特尔做起了图书管理员工作。那里的赫尔佐克-奥古斯特图书馆当时是德国最大的图书馆之一，馆藏图书超过10万册，以及6000本手稿和4000本古版书。1770年7月27

日莱辛在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

“这个地方好像是生来就为我准备的一样。我一点都不后悔我拒绝了其它所有的工作。这个职位的报酬是：600 塔勒的薪水，还有免费提供的一套住房和取暖的木材。如果我再缺钱用，那就是我自己的错了。最使我满意的是图书馆，它的名气很大，您一定听说过它。我觉得这个图书馆比我原来想像得还要好。我现在可以忘掉那些在困难时期不得已卖掉的书了……”

莱辛在沃尔夫比特尔生活了整整十年，一直到他 1781 年 2 月 15 日去世。总而言之，这 10 年对于莱辛来说不是幸福的 10 年。四十岁的他在空空荡荡的宫殿般的图书馆里经常感到十分孤独：

“我一个人非常孤独地住在一个又大又冷清的宫殿里。从汉堡那个熟悉的圈子来到这冷清的图书馆，其中的变化是巨大的，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不喜欢由黑到白的剧烈反差变化的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莱辛在接任图书管理员的职位后不久就和

汉堡的埃娃·柯尼希订了婚。由于他的收入并没有原先说好的那样，他不得不把婚期推迟了五年。图书馆的工作有时候让他感到很烦，因为这些工作分散了他在其它计划上的精力。四十七岁那年他才终于得以结婚。一年以后，1777年的圣诞节，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只活了24个小时，而妻子因生产还重病卧床。莱辛在给一个祝贺他儿子出生的朋友的信中写道：

“因为我的妻子还病危在床，所以我要抓紧这片刻的时间，向您表示感谢，谢谢您亲切友好的问候。我的喜悦是非常短暂的；我是多么不愿意失去他啊，我的儿子！您不知道，我做父亲的那几个小时已经使我沉醉于父亲这个角色了！——我的儿子，他是多么理智啊！多么理智啊！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人们不得不用铁钳把他拉到这个世界上来，然而不久他就夭折了。这难道不是理智吗？他抓住了第一次机会，却又放弃了。这难道不是理智吗？无疑这个小家伙还将从我这儿拉走他的母亲！因为我能救活她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我多么想和其他人一样拥有这

幸福的一切！但是这对我来说很难实现了。”

十天后，莱辛的妻子也去世了。在她去世的那一天莱辛写道：“我的妻子死了，这样失去亲人的体验我已经有过一回了。我很高兴像这样的体验在我这里不会再发生了，我感到很轻松。”仅仅三年后，还不到五十二岁的莱辛也去世了。在此两年半前，他著名的戏剧《智者纳旦》出版了。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正文